紐約時報書評 日本各大媒體一致推薦

本書提供所有從事新聞、兩岸、戰略研究、大陸台商的全新認知
讓您立即掌握到如何辨識中國大陸媒體報導真相之金鑰

看禁书就上禁书网：http://www.bannedbook.org/

霧鎖中國

中國大陸控制媒體策略大揭密

何清漣 著

《聯合推薦》

國立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所長◎張錦華
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系主任◎馮建三
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所長◎王高成
前國防部少將軍事發言人．銘傳大學傳播學院教授◎吳奇爲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系主任◎黎安友
(Andrew J. Nathan)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看禁书就上禁书网：http://www.bannedbook.org/

〈推薦序〉

萬山不許一溪奔

張錦華
國立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所長

我最近在做一份研究，分析台灣的媒體如何報導中國大陸與貪腐相關的新聞。一般學者聽到這個題目，都很好奇的問：為什麼選這個題目呢？中國有貪腐，台灣也有啊！我問他（她）們：台灣的高捷泰勞弊案，最近的ETC收賄案，媒體都接連報導數個星期，甚至數個月之久，相關官員下台的下台，起訴的起訴，如果有人再爆料背後還有其他藏鏡人，媒體顯然仍可以再報、再查。但是，大家看過任何一個中共的貪腐弊案，被連續報導超過兩天以上嗎？甚至，大家記得最近台灣的媒體報導過任何一個中共的貪腐弊案嗎？

答案是：沒有人能答得上來。很多人會說：我看到媒體報導大陸如何高速開發、很多台商投資成功賺大錢的例子；也常常看到報導大陸的黑心商品，或是偶爾有少數台商遇害的消息。但是，確實沒有看到任何中共的重大的貪腐弊案，這個現象很嚴重嗎？

總部設在巴黎的智囊機構「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曾在去年發表了一篇報告，指僅在2003年上半年就有8,300名中國官員逃到美國。另外還有6,500名涉嫌貪污腐敗的官員，為逃避法律懲罰在中國國內隱藏起來。報告還指出，「在逃官員中大約有

看禁书就上禁书网：http://www.bannedbook.org/

2/3是國有企業的高級主管，非法帶出國的資金數額約在87.5億和500億美元之間。」

我們當然不完全確定這個數字的準確性，不過，從相關的資料中已可發現，中共的貪腐問題不但是很嚴重，而且，累積的民怨已不可想像。例如，根據中共官方公布的統計數字，1993到2003的十年間，中國民眾抗爭事件從每年1萬件起，逐年大量增加，2003年已有6萬件，2004年爆發了7萬4千次維權抗議（這是指100人以上的民眾抗爭事件），參加人數估計高達360萬。到了2005年則更創新高至8萬5千件，平均每天發生200件以上！

因此，OECD指出，貪腐猖獗正在威脅中共統治的合法性。中國普遍存在的嚴重貪腐正成為社會不滿的一個源頭，形成目前中國社會的主要不安因素，並對中共政權造成威脅。

但是，我的研究發現，台灣的各電視台在去年（2005）幾乎沒有報導任何一件！主要報紙如中國時報、聯合報，平均每年只報導了不到5件，而且，通常這些案例中的主犯都已經被繩之以法，無論這些貪腐案牽連數百人或廣及各種層級，就是從來沒有中央高層涉入，報導中通常顯示中央高層已經在努力懲治貪腐；而且，從來沒有一個貪腐個案被報導一天以上！

這是怎麼回事呢？台灣媒體不是揭弊案的高手嗎？我們不是有不少媒體派駐大陸採訪嗎？世界各國不是也有很多媒體派駐大陸嗎？大陸兩千一百多家報紙、一千三百家廣播電視台，難道都沒有報導嗎？大陸媒體不是已經比以前更開放了嗎？還有四通八達的互聯網呢？為什麼它們可以報導黑心商品，報導超女、報導各種光怪

看禁书就上禁书网：http://www.bannedbook.org/

陸離的社會百態，卻完全不會報導這些不利於整體中共形象的貪腐案例呢？這是怎麼回事？

如果你對這些問題感到好奇不解，如果你希望知道中共控制媒體的全貌，如果你想知道大陸記者被整肅的悲慘狀況，你一定不要錯過這本書！這本書的價值不僅是一部資料豐富，解析透徹的著作，它其實是一個不向強權妥協、並已付出沈痛代價的知識份子的生命告白！

何清漣的這本書，和她其他的著作一樣，是在刀子口上做學問，在揭開刀口的傷痕和血腥的同時，隨時也可能為利刃所傷。這當然不是一部普通的分析中共媒體控制的學術著作，要了解本書的價值，先要了解它的作者，以及這個作者所處的時代。以下的介紹是綜合相關的報導而成：

湖南才女　鐵肩妙手

何清漣，一九五六年出生湖南邵陽，中學未畢業即下放農村，由於其知識分子家庭出身背景，在文革中屢遭打擊與孤立的痛苦屈辱經驗中成長。但在一片紅衛兵造反的年代中，她卻努力讀書，自學完成中學課程。恢復高考後，憑藉其過人的毅力和聰慧考入湖南師範大學歷史系，其後再入上海復旦大學經濟系。1988年獲碩士學位。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並先後在湖南財經學院，廣東暨南大學任教，後在深圳任雜誌和報紙編輯。

何清漣第一部受到學界注意的作品為「人口：中國的懸劍」，

看禁书就上禁书网：http://www.bannedbook.org/

但成名作則是「中國的陷阱」(大陸出版，書名為《現代化的陷阱》)。「中國的陷阱」寫的是改革開放後，至一九九七年之前被扭曲的社會現象，尤其是官僚尋租（亦即貪腐行為），造成社會的不公。該書未出版前，曾輾轉連續尋求過八家出版社，所有看過的編輯都極為讚賞，但卻沒有人敢於出版。直到受到劉吉的好評及作序才獲得出頭的機會。劉吉曾是江澤民的幕僚、前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曾經約何清漣進京長談了五小時後說：「這本書將在中國歷史上留下一筆。」

《中國的陷阱》被認為是剖析中國轉型問題最尖銳、最深刻的著作之一，不僅在中國引起巨大迴響，而且國際各大媒體《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華爾街日報》等紛紛以巨幅進行報導，甚至登上國際最王牌的書評雜誌《紐約書評》封面。據前上海《世界經濟導報》的法律編輯兼記者張偉國說，部分認同她的官員大力為她宣傳，汪道涵就隨身帶著一本《陷阱》，所到之處，不遺餘力地向全國黨政官員推薦。

《我們仍然仰望星空》則是何清漣近年的作品，該書是由多個中短篇評論，以及一個自傳式敘述組成。其中，二萬五千餘字的「當前中國社會結構演變的總體分析」最具震撼力。文中清晰的分析了中國當前各利益集團精英，如何在權力市場化為起點的這場改革中的形成經過，以及造成嚴重貧富差距，階級分化和對立等尖銳問題，該書出版不到十日便售完。北京學術界還就此文自發性的組織了十多場研討會。

國際上一些關注中國問題的國家，也十分重視何清漣的意見。一九九八年下半年開始她先後應邀訪問日本、瑞典、美國等國，與

看禁书就上禁书网：http://www.bannedbook.org/

各界交流、分享研究心得，這大概是她平生難得的一段愉快時光。

不料，二〇〇〇年六月何清漣訪美回國不久，即被告知，中央已下令「降級減薪」、解除《深圳法制報》專稿部副主任職務，並且不准以本名或筆名在任何報刊雜誌上發表任何作品。導火線據說就是前面提到的「當前中國社會結構演變的總體分析」。在經歷了長期被跟蹤、監視，住處被入侵，她發覺生命危在旦夕之時，即時的選擇了逃出中國，終能成功的擺脫的監控，於二〇〇一年六月她到了美國。

何清漣在接受外界訪問時，曾特別強調，她堅持做一個有道德理想的中國知識分子。湖湘文化一向以經世致用，敢於擔當天下事為己任。湖南那所天下聞名，長達千年歷史的嶽麓書院裡，至今還留有很多表達湖南士大夫以天下為己任的豪情的詩詞。她生於湖南，長於湖南，湖湘文化對她影響很大。半世紀以來，「兩廣人立言，江浙人出錢，湖南人出血」。作為一個湖南人，她已用半生的經歷，樹立了一位不懼流血的知識俠女形象。

為什麼這位經濟學者會跨足媒介領域，再度出版了一本資料豐富，析理透徹，強烈的散發著一股鐵肩俠骨、勇者無懼的二十萬字的大著《霧鎖中國——中國大陸控制媒體策略大揭密》呢？

事實上，何清漣長期在中共的媒體工作，並因言論入罪，甚至命在旦夕，繼而隻身逃亡海外，她對中共控制媒體的手法，她優秀的媒體同業身陷鐐銬、有志難伸的遭遇，以及媒體管制和整個中共制度間緊密糾纏的關係，不但有親身體會，掌握第一手資料，也有著切膚之痛的義憤填膺。

因此，書中詳細的提供了中共控制媒體的各種法律、規定、禁

看禁书就上禁书网：http://www.bannedbook.org/

截命令，針對所謂的社會敏感問題、政治體制問題，如何高度而嚴密的控制國內媒體、網路媒體、外國記者（包括台灣記者）。同時，她也試圖揭開外商帶來媒體自由化的迷思、跨國公司和網路公司如何向中國屈服的事實，中國媒體如何執行政府的仇美反帝和鼓吹民族主義，如何編造中國GDP高速增長的神話，她更蒐集了近年來大量而完整的中共迫害媒體和記者的記錄和分析。這些重要議題，必將成為今後中共體制和傳播研究及教學的重要課題。

讀完這部著作是沈痛和憤怒的，沒有自由的媒體、獨立的司法、民主的機制，言論自由像一隻籠中之鳥，籠子大小或有不同，但終究是插翅難飛。在一個真正的自由民主中國到來之前，我們能為她做些什麼呢？作者最後的呼籲十分深沉有力：中國的希望在一些為了自由與強權抗爭的勇士身上，這些勇士當然包括書中所列的那些為了新聞自由而付出犧牲的人，正是他們的努力在一點一滴的改變著中國。……我真誠的希望國際社會少一些為了利益而放棄原則的公司、團體或個人，因為中國人民需要國際社會民主正義力量的熱誠幫助。

這本書顯然是這樣的努力之一，這本書在台灣所徵求出版的第一家公司——黎明文化公司，在經過徵詢學者專家的專業意見後，立即欣然同意立即出版，也是令人鼓舞和敬佩的；而正在閱讀本書的您——相信也將加入這份讓涓滴匯成江河的努力。南宋詩人楊萬里的詩「桂源鋪」或許更生動的描繪出這份期待：

「萬山不許一溪奔，攔得溪水日夜喧；到得前頭山腳盡，堂堂溪水出前村」。

看禁书就上禁书网：http://www.bannedbook.org/

〈推薦序〉

大陸傳媒何去何從？

馮 建 三
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系主任

2006年初《中國青年報》《冰點週刊》遭停刊，新聞傳出後在台灣引發了一陣反應。相較於過去台灣傳媒對於類似事件的迴響，這次的輿情約略創了一點小的紀錄。

這就是說，假使從龍應台在《中國時報》等海內外華文報紙同步發表的批評文章（〈請用文明來說服我〉）起算（1月26日），至3月15日為止，台灣的四家主要報紙對這則消息的報導及相關評論，數量不少、呈現的意見光譜也相當多樣。

《自由時報》有六篇，是外電編譯及外稿評論，沒有任何一篇是記者撰寫。《蘋果日報》是十篇，除了一篇內稿，其餘的作者身分與文稿性質與自由相同。以上兩家報紙對於冰點事件的再現，倒也符合它們過去的表現。相比之下，比較不尋常的是《中國時報》與《聯合報》。前者以最顯著的篇幅處理，甚至派遣資深記者前往北京，在查禁與壓制的負面事件中，帶入了正面訊息。中時對於冰點的當事記者、外界的奧援、傳媒自由度的有限增強、新技術強化傳媒人衝破言論封鎖的空間，大致抱持審慎的樂觀基調。中時總共

看禁书就上禁书网：http://www.bannedbook.org/

刊出了二十七篇文稿，並且全部在第四版或兩岸（第十三）版，其中八、九成是中時記者的撰述。

聯合在新聞版面也投入了七篇，其中六篇是記者評論或報導，一篇是外稿。但最特殊的地方是，《聯合副刊》另刊登了七篇評述文章（其中三篇文長、各刊兩日），起於陳映真發表在2月19與20日的長文，與「龍應台女士〈請用文明來說服我〉的商榷」。最近一篇則是發表於3月15日的文章，該文的討論架構不是言論與新聞自由、不是民族主義與帝國主義、不是中國內部的三農或貧富差距與環境生態等等問題、也不是反美與否，該文是作者路況馳騁其「無窮想像」的場域。路況以自己所熟悉的學術資源，有下列說法，「真的可以突破美國文化霸權的思想禁制與陳腔濫調，進行『非美式』觀點的自由獨立思考……大概只有法國的前衛思想家……」。接下來，路況表示，「但那畢竟……是書空咄咄的書齋玄想」，最後是路況心境的宣洩：「放眼今日世界形勢，似乎還是中國最具有走出一條『非美式』路線之潛能……開創新局。」

這是旁觀者清嗎？路況、或者更準確地說，憂心美國的主流經濟生產模式及其相應生活方式終將不利於人類、終將不利於所有生命現象之存在的人，是在以一種局外人的說法、用語或期許，對於局內人、也就是生活在中國大陸的人，提出了一種局內人難以承受之重，因此徒然暴露了局外人的非份之想與不識實務嗎？還是，局內人、局外人的分別，普世性與特殊性的差異，其實在時間這個最偉大的夷平者與創造者眼中，都只不過是一體的兩面，都透露了「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這個命題的曖昧

看禁书就上禁书网：http://www.bannedbook.org/

魅力與明確困境？

在關注並閱讀了這段期間這些報紙的報導與評論後，台灣的讀者假使能夠進而閱讀何清漣女士這本書，必定會有莫大的領悟。作者曾經是局內人，但目前不得不是局外人，她以相類於其知名著作《中國的陷阱》的筆調與豐富素材，通過了親身的經驗篩選，以更系統化及更具有歷史縱深的視野，導引我們認識中國的傳媒。

究竟什麼是中國傳媒？假使僅從表面觀之，存在著很多的局外人難以理解的地方。

比如，中國大陸從黨、立法、司法與行政等部門，相繼以各自的宣稱或行動，乃至於立法，表明中國官方也在使用西方傳媒的語言，或說中國官方也很重視傳媒應有的重要職能：輿論監督。又如，起自2001年的無錫市，至2005年的深圳市，中國已經有20餘個地方政府執行了預防職務犯罪的法規或行政命令，其中均明列輿論監督的地位。2004年2月，作為「反腐敗」的一個環節，《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試行）》出爐了，它將「輿論監督」列入十種監督制度之一。2005年5月10日，廣電總局依據中共中央辦公廳《關於進一步加強和改進輿論監督工作的意見》和中宣部《加強和改進輿論監督工作的實施辦法》，對各下級單位發布了《關於切實加強和改進廣播電視輿論監督工作的要求》。

但是，不爭的事實是，雖然有關藥品、食品、生態環境……等民生議題，以及對其他公共領域的人與事之監督，並不欠缺，惟如孫旭培教授所說，涉及「高層次」（對國家機關及其公務人員）的輿論監督依然薄弱。再者，作為最權威的輿論監督節目，也就是中

看禁书就上禁书网：http://www.bannedbook.org/

央電視台的《焦點訪談》；以及作為最知名的跨地區輿論監督平面傳媒《南方周末》本世紀以來的批評力道，是在減弱而不是因為有了這些法規而增強。中國的輿論監督至今多屬打蒼蠅、不打老虎、打死老虎……，以致於許多人說，只要政治體制沒有調整，輿論監督之說也就只是在說說之後，折損了這個概念應有的鼓舞與激勵作用。最壞的情況下，甚至使得有心之人，望輿論監督這個術語而卻步，不願提及，而不是選擇運用官方也得認可的概念，推進傳媒的進步空間。

大格局既然是如此的詭異，那麼言者諄諄、聽者藐藐的「荒謬」事情，或是你鼓勵、我壓制的例子，也就見怪不怪。比如，2003年8月28日，「小小」的地方單位江西定南縣政府，因為《人民日報》報導了它違法拆遷私人房屋的行為，竟然敢於「太歲頭上」動土，將當日的中央一級刊物扣押，不准其在縣內發行，事隔兩天雖放行報紙，卻硬是將該則報導撕下。2005年7月下旬，浙江與江蘇這兩個經濟同樣發達的省份，幾乎同時對於輿論監督的要求，有所回應，只是方向剛好相反。江蘇要求媒體必須事先將稿件交給被批評對象審閱，如果被批評對象未簽署意見而傳媒逕自發稿，記者、編輯、值班主任，將受處罰。但浙江明確規定，任何單位及個人若以任何形式干擾輿論監督，就必須接受批評教育，也可能被「移送司法機關」處理。到了9月中旬，另有新聞傳出，指廣東、河北等十七個省市聯名，要求中央發文，禁止傳媒異地監督，但新華網同時發表文章，應該是意圖為中央輿論監督，加油打氣。

若說中國的現況與趨勢，游動於陽奉陰違的、限縮的、膚淺

看禁书就上禁书网：http://www.bannedbook.org/

的，以及合理的、擴張的、深入的輿論監督之間；那麼，中國傳媒的現狀與未來究竟如何定性，是個更大的問題。1949年之後，依其財政來源，我們或許可以說，中國傳媒經歷了三次大轉型。第一次止於1957年。其後至1979年1月28日上海《解放日報》刊登廣告之前，是第二次。目前這種將近定型但還沒有完全定型者，不妨稱之為第三個大的轉型。中國政府在這段期間投入於傳媒日常營運所需的資金，比例日漸減少（這裡說的是日常營運，而不是整體資金構成，是因為中國廣電總局從1983至2003年間，投入於廣電基礎設施……等等項目的資金，估計約是電視所有廣告收入的2至4倍），這就使得傳媒的性格不得不產生變化。雖然行政力量還是發揮關鍵作用，但利潤競爭及其佔有的強化，特別是中國成為世界貿易組織的第143個會員（2001年12月11日）以降，這種思維與實作對於傳媒的滲透日深，也是實情。這些力量最後會將中國傳媒推向何方？環境如此險峻，浸淫其中的傳媒人員，是將臣服於逐利的邏輯、受制於行政權力當中的不當箝制、是共謀於這兩股力量，還是，官方仍有機會與能力，提出符合傳媒工作者需要的傳播政策，運用但也駕馭傳媒市場、使利潤競爭服膺於非利潤的競爭而出現一種「協調式競爭」的傳媒架構？

對於這組問題，本書提供了一些線索，但無法回答。曾經擔任1998至2001年的《南方周刊》常務主編、現任香港大學中國傳媒計畫主任與上海大學研究員，於2005年12月受邀至台北市擔任駐市作家的錢鋼，在來台之前曾於9月底在美國發表講演。他的講詞

看禁书就上禁书网：http://www.bannedbook.org/

不啻是從另一個角度與這組問題，有所婉轉的對話。錢鋼提及，有人說當前的中國傳媒是「虛假偽造、枯燥無聊、備受檢查」(phony,boring and censored)，他認為，「枯燥無聊」是言過其實，而「暴力、戲劇化、性訴求」也許抓住了部份圖像，但他自己寧可選取的三個字眼是「控制、變化與混亂」(control, change and chaos)。

這樣的「變化」會往哪個方向移動？「錢權的結合」、「能賣就是好新聞」，或「不受政府控制也不屈膝於商業」？關注中國及其傳媒前景的人，仍然必須以各自認知的價值，通過穩健的態度，既有論述又有行動，為營造符合各自理念的情境，努力準備，使其提升而不是沉淪。

看禁书就上禁书网：http://www.bannedbook.org/

〈推薦序〉

撥開那層政治的迷霧

王高成
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所長

歷史上所有的極權國家都需要掌控媒體，因為如此可以美化國家領導人，封鎖任何不利於政府的消息，也讓人民不知道自己所處社會的真實情況，尤其是當真相並不理想時。易言之，對媒體的掌控有助於政權的穩定，而所有的極權或專制的統治者都害怕自由的媒體。

作為一個一黨獨大的專制國家，中共必然會掌控資訊的傳播，因為國家的真相將會惡化人民對政府的觀感，百姓會知道原來有這麼多貪污的官員，大陸的發展是這麼的不平衡，城鄉的差距是如此之大。尤其是對於廣大的貧苦農民而言，當他們得知自己的處境相對於城市的居民是如此不利之時，對於一個口口聲聲以農民革命起家，要照顧農民的政權會有何觀感是可想而知。對於統治者而言，掌控媒體不只可以保護自己，更可以鞏固權力。透過媒體的操控，統治者可以傳播有利於鞏固自己權力的意識型態，形塑百姓的想法，使其服從自己的領導，並願為某種政策目標而犧牲奮鬥。例如大陸過去在毛澤東時期，中共當局宣揚共產主義的優越性，現在則

看禁书就上禁书网：http://www.bannedbook.org/

是以經濟發展及民族主義的意識型態做為掌控民心的依據。因此，對媒體的掌控也是操控人民思想的一種手段，有利於統治者政權的鞏固，即使是在號稱較為開明的胡錦濤統治下的中國依然如此，最近美國的兩大入口網站「雅虎」及「甲骨文」在大陸被迫限制某些資料的搜尋便是明顯的例子。

媒體的自由化不僅是國家民主化的重要指標，也與政治的穩定及國家的安全息息相關。誠如本書作者指出，當SARS於二〇〇三年初在大陸廣東省開始蔓延時，當地及中央政府的官員仍然試圖加以隱瞞，結果卻使得疫情繼續擴大，造成更多人的死亡。而隨著疫情的擴大，也使得中共當局在後續對抗SARS時面臨更大的困難，不僅重創了政府的威信及國際的形象，也嚴重影響了大陸的經濟活動。中共當局操控媒體的目的，係為防止百姓知道社會的真相或批評政府，以維持政權的穩定，但如此做卻無形中替中央及地方政府官員建立了一層保護網，許多貪污不法的弊端無法被揭發並接受法律的制裁。短期而言或許有助於政權的穩定，但長期而言貪污腐化終將嚴重侵蝕政府的基礎及累積大量的民怨，導致政權的垮台，東歐及蘇聯共產政權於一九九〇年前後的相繼倒台正是明顯的例證。因此，言論及新聞自由之所以可貴，不僅在於對人權的尊重，也有助於反映政府施政的弊端及官員的不法，對於有心治理好國家的領導者而言，其實是有幫助的。隨著經濟上改革開放的推動，以及與全球化接軌的趨勢下，大陸百姓的民智漸開，白領階級人數增加，社會日趨多元化，與外界溝通的管道增加，中共當局將愈來愈難掌控及封鎖資訊的流通，勢將成為政權生存的一大挑戰。

看禁书就上禁书网：http://www.bannedbook.org/

本書作者何清漣女士以自己第一手的觀察經驗，深入剖析中共當局操控媒體的手法，以向世人揭露大陸箝制新聞的真相。作者分別從歷史的發展、法治的限制、記者的掌控、消息的封鎖、網路的監控及意識型態的傳播等角度，探討及分析中共領導人操控媒體及資訊的各種手段。因此本書誠為有意了解中國政府如何操控媒體及資訊，及當前大陸的政治、社會及新聞報導現況的絕佳材料，值得關心這些議題的人士或團體閱讀。

新聞及言論自由為民主政治的重要基石，是人類的基本權利，也有助於社會的進步及政治的清明，吾人期望中國大陸能早日停止對媒體與資訊的操控，讓十三億人民獲得更多的民主與幸福。

看禁书就上禁书网：http://www.bannedbook.org/

〈推薦序〉

真情告白，語重心長

吳奇為
前國防部少將軍事發言人
銘傳大學傳播學院教授

中國對許多人來說，既充滿了神秘與好奇，也滿懷理想與浪漫，只是隨時改革開放的腳步，封閉的大門一旦被打開，霧裡的中國日漸清晰，就在此一同時，政治的黑手像陰影般隱隱浮現，呈現在人們面前的益發變得似真似假，讓想要一窺真相的世人不知如何分辨！唯獨可以確定是，現在的中國已經變得再也不是過去的那一個中國。

處在一個追求民主政治與專制集權交叉口上的中國，作者何清漣形容「民主」宛如夢中女神，只見女神的裙襬飄動，卻一直無法將這尊女神請入中國的政治殿堂。

其實，在歷史的轉折中，又豈止是作者有這樣的嘆息呢！一九八二年，美國知名的研究中國史泰斗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在他的「回憶錄」中，把中共的興起定性為「不可能被壓制的一種革命運動」，可是到了一九九一年，在他生前最後的著作「中國新史——費正清論中國」書中，經由長期細密的觀察所得的結論卻是「中共政權是專制王朝的現代翻版」。

看禁书就上禁书网：http://www.bannedbook.org/

學者的論述或有不同見解，但是還原歷史見解的社會現象與生民福祉，毫不隱瞞地述說這一代中國人的苦難與真情。「霧鎖中國」處處可見這些活生生的事例。作者所揭露的真實情況，間接印證了費正清的歷史見解。

誠如作者在書中所說，「在民主國家，媒體是社會形勢變化的風向標，也是政府了解民意的重要管道。」而中共當權者，卻用極端的手段，試圖操縱媒體，使得資訊流通嚴重阻塞，民情無法上達，決策階層既然無法充分了解民間實況，決策作為的偏頗與失誤也就必然發生。

這類現象，說穿了並不是現在才有，早在一九八二年，紐約時報駐北京特派員包德甫（Fox Butterfield）藉採訪之便，親身訪談基層民眾，寫下膾炙人口的「苦海餘生」，他曾生動地提到，有一次他從上海搭火車返回北京，才上車，就見到女車長迎面微笑對他說：「歡迎搭乘本車」，隨即對著其他乘客大聲宣布：「我們有一個外國人在車上，他是一名美國記者，會說中國話，而且說得很好。」包德甫在訝異之餘，才充分體驗到嚴格控制的無所不在。

又十年，紐約時報的紀思道、伍潔芳夫婦在一九九三年忠實記錄他們在中國的所見所聞「驚蟄中國」。中共透過媒體掌控資訊，再度獲得證實，因為大陸人民都知道「假如電視裡否認什麼？通常表示那是真的。」

作者把中共經由媒體對人民的控制，以一九七八年作為分水嶺，在這以前，新聞管制相對寬鬆；在這以後，以迄於今，管制措施表面放鬆，骨子裡變本加厲，更多的規範像加在孫悟空頭上的緊箍咒，無論如何都逃不過中共政府的掌控。

看禁书就上禁书网：http://www.bannedbook.org/

追根究底，不論中共對媒體控制的手法如何改變，萬變都不離他的理論源頭——「社會需要論」。也就是說，中共向來視統治下的報紙、廣播、電視、網路等新聞工具，都是以實現社會主義為目標。媒體必須是被黨完全地、絕對地控制，要以生動活潑的事件，證明黨的正確，對新聞工作者的要求，不是其學養、眼光、寫作能力，而是馬列主義理論的修養和對黨的忠誠，如此一來，事實報導與客觀評論不過只是幌子罷了。這也無怪作者逐一指出中共違反民主規範，施暴記者與迫害媒體的事證層出不窮，可歎的是世人總是選擇性地健忘了它們！

自二〇〇三年，中共公開宣示要進行輿論戰、心理戰與法律戰。就以輿論戰與心理戰來說，其目的即是處心積慮地思考如何控制媒體與輿論，強化內部民眾對中共的向心，進而引導國際輿情對其作有利的支持。本書雖未直接論及輿論戰與心理戰，但所舉實例幾乎無一不與此一政策息息相關。

例如，中共正積極運用現代化科技打造的電訊監控系統－金盾工程，彷彿讓世人重回到歐威爾（George Orwell）的小說「一九八四」，生活在「老大哥」嚴密監控下的社會，一舉一動，一言一行都在「老大哥」的掌控中，昔日小說情節竟成了今日的實景，若不是作者的大聲疾呼，究竟有多少人會加以注意呢！

作者是一位訓練有素的社會科學研究者，懷抱對民主自由的理念，經歷教學與媒體實務經驗，深刻剖析中共外表開放美麗，實則腐敗、醜陋的政治運作與媒體操弄。透過本書的真情告白，衷心期盼作者「有效幫助中國人民建立一個民主自由的新中國」的願望能早日達成。

看禁书就上禁书网：http://www.bannedbook.org/

〈作者序〉致台灣讀者：

中國「媒體市場化」的神話褪色之後

何清漣
2006年3月初寫於美國新澤西州

本書承蒙台灣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厚愛，得以在台灣出版。當其時，正是全世界都開始注意中國政府日益加緊控制媒體之日。

從2005年年底開始，中國媒體接連受到政府整肅的消息在網路上廣為流傳，從《新京報》停刊開始，繼之是《中國青年報·冰點》被封，《公益時報》總編換人，《深圳法制報》關閉，《百姓》一度停刊。儘管事情發生的原因各不相同，但這一連串事件卻組成了中國媒體受政府整肅的悲情畫面。緊接著就是美國國會在人權組織的壓力下，就幫助中國政府控制網路一事，兩度傳召微軟等四大網路公司。中國政府控制媒體的專制行為終於成為國際社會關注的話題——而這距離我完成《中國政府如何控制媒體》（中國人權資助）這一研究報告已經有兩年半之久。

研究中國政府如何控制媒體的想法，並非始自我被迫流亡海外。早在當年就職於深圳一家媒體時，因為對中國政府控制媒體的內幕有太多的瞭解，就一直在蒐集資料，期望有一天能夠將其寫出

看禁书就上禁书网：http://www.bannedbook.org/

來公諸於世。而來到美國之後，承蒙總部設在紐約的中國人權資助，使我在2003年完成了《中國政府如何控制媒體》這一研究報告。目前這本書稿就是在當年這部研究報告的基礎上增補修訂完成的。

這本書的母稿是中文，但由於種種原因，這部書稿的中文稿卻直到今年才由台灣黎明文化公司出版，它的英文版行將出版，而日文版卻已經於2005年1月出版，書名為《中國的謊言》。

通過這本書闡述的事實，讀者會明白一個嚴酷的現實：在中國，是中國政府在監督媒體與媒體從業人員，而並非媒體這些所謂「社會公器」在發揮輿論監督作用——而且中國媒體與民主國家媒體最大的不同，完全可由中國政府對媒體的定義而見一斑，中國的媒體號稱「黨的喉舌」。由於拙著對中國政府制度化控制傳媒已有系統的闡述，在這篇為台灣讀者寫的序言中，筆者就只分析在寫作這本書時，中國之外的媒體採訪我時，經常會提出的一些帶有普遍性的疑問——因為這些疑問代表海外對中國傳媒現狀的一些普遍誤解。

誤解之一：市場化能夠促進媒體自由化

當我申請「中國政府如何控制媒體」的研究資助時，反覆遇到的一個提問是：「中國的媒體正在市場化，外國傳媒也在陸續進入中國市場，這些都將促使中國傳媒業的自由化，這種情況下，中國政府還能夠成功地控制媒體嗎？」——這個問題遠未過時，就在2

看禁书就上禁书网：http://www.bannedbook.org/

月16日BBC英文部的Tim採訪我時仍舊提出同樣的問題。

我只能儘量簡明扼要地陳述事實。中國媒體業人士對市場化有一段精確的描述，那就是：在不放鬆新聞管制的情況下迫使媒體下海（即市場化），有如先捆住一個人的手腳，再一腳將這個人踢下海。在禁區多多、新聞來源相對單一的情況下，中國媒體為了在市場中立穩腳跟，只好被迫在聲色犬馬上做文章，中國網路媒體上的色情內容早已經遠遠超過了世界各國。而中國政府也樂意將國民引導到放縱物欲，不問政治的犬儒式生存之道上去。至於外國媒體在中國投資，也必須遵循中國的新聞審查規則，儘量不碰政治話題。

而外國各大媒體在中國為了生存，為了在巨大的中國傳媒市場當中分一杯羹——雖然這僅僅只是想象，但已經讓他們激動不已，懷抱這種理想的典型是默多克的新聞集團與英國的BBC。他們忙於向世界描繪的是這樣一幅圖景：中國傳媒市場是一塊巨大的蛋糕，如何瓜分這塊蛋糕，將牽涉到21世紀世界媒體市場的利益格局。如果說世界各大傳媒在進入中國市場初期，還曾經幻想過假以時日，緩慢地促進中國的新聞自由，但到了2000年以後，早已沒有任何傳媒集團愚蠢到要在中國堅持傳媒理念。大家心照不宣的話題是：在絕對服從中國政府政治領導的前提下，中國當局究竟將中國媒體市場這塊蛋糕賞給誰吃？

對自己在中國市場上瓜分一塊蛋糕最有信心的當數世界傳媒大亨、新聞集團（News Corp.）的默多克。多年來，為了成為中國政府的好朋友，默多克曾花了不少精力金錢與中國高官結交，並獲得相當大的成功。而他的成功秘笈就是從不涉足政治領域，更不關

看禁书就上禁书网：http://www.bannedbook.org/

心中國的民主、自由與人權，甚至中國媒體都關注的民生也不在他的視野之內。對促使中國媒體自由化，他更是刻意表現出一副漠不關心之態。他甚至還採取了一些中國式的借道方式，比如投資香港鳳凰衛視（這家電視有很明顯的中國政府背景），希望通過這種方式進入中國傳媒市場。總之，直到2005年8月3日中國文化部發布「關於加強文化產品進口管理的辦法」之前，誰想要告訴世界：市場化並不能促進中國媒體自由化，誰都會認為言說者有偏見。BBC雖然還未走得那麼遠，但至少也效法默多克的態度。

默多克在中國撞了牆之後，市場化將促進中國傳媒自由化這一聲音暫時沈寂下去，但將市場化與中國政治民主化掛起鈎來的聲音還照樣那麼強烈。這些人誤解了一個基本事實：市場經濟體制可以與多種政治體制相結合。譬如歷史上曾有納粹的極權政治，現實中有美國的民主政治、新加坡的威權政治與拉丁美洲國家的軍政府統治，這些國家都是高度奉行市場經濟的國家。

誤解之二：網路能夠促進中國的資訊傳播自由化

20世紀留給人類最偉大的科技文明就是網路的發明與普及。毫無疑問，在若干年後，它必然對中國的政治民主與新聞自由產生極其深刻的影響。但如果將這個結論往近拉至現在及今後5～10年，這個結論就不能成立。因為網路在中國的使用，卻讓中國政府投入鉅資發展了網路業的一大偏門：網路控制。

作為一個網路的使用者來說，要想弄清楚中國政府如何控制網

看禁书就上禁书网：http://www.bannedbook.org/

路並非易事。我在寫作中國政府管制網路這一部分時，非常有幸地發現了幾篇英文文章，其中對我幫助最大的那篇題為「金盾工程：中國龐大的電訊科技監控系統」。該文作者Greg Walton曾參加中國的互聯網（網際網路）開通建設工作，對外國公司提供技術支援，幫助中國政府建設網路控制系統的情況非常瞭解。回到美國後良心發現，寫了這麼一篇文章。另一位作者乾脆在他的文章裡指出，美國有責任幫助中國人民奪回互聯網這一促使資訊自由流通的工具，「我們可以鋪下革命的聯絡網路。如果我們不這麼做，中國未來的世世代代將不會原諒我們。」

我根據自己對中國互聯網的分析，以及這些英文文章對外國高科技公司內幕的介紹，寫成了有關互聯網控制的有關章節。此後，我多次在美國國會作證時提出要求：希望美國立法限制美國公司與中國政府之間進行這種不光彩的技術合作。

在研究中國網路控制方面起了重要作用的有哈佛大學的一個專案「openNet Intiative」。這個專案的研究小組有關中國的報告是《中國的網路過濾，2004～2005》，而事實上他們這個報告是連續性的，在此之前還有2003年中國網路控制情況的一個報告。去年這個專案的主要參與者在國會的美國經濟安全審查委員會作證時，也曾要求國會立法限制美國公司幫助中國控制網路言論。

在這裡還必須要提到的兩個國際組織：總部設在巴黎的「記者無疆界」與總部設在美國紐約的「保護記者協會」。這兩個組織從未相信過中國政府的謊言，一直在為促進中國的新聞自由而做持續不懈的努力。我自己當年遭受中國政府的迫害，被安全局特務24

看禁书就上禁书网：http://www.bannedbook.org/

小時全天候監控時，記者無疆界組織為此專門給江澤民寫信，要求停止對我的迫害。其他受迫害的中國記者也都得到這些組織的關注。現在世界終於相信中國媒體嚴重受到控制，言論自由於中國人還只是個遙遠的夢，這裡面，有上述這些組織與研究者的功勞。

誤解之三：中國人可以罵國家領導人＝言論自由

還有一些人士（包括常常回國的海外中國人）常說：中國人已經有了言論自由，因為他們可以罵國家領導人。有一位從事人權活動的女士曾充滿懷疑地對我講：她的家人告訴她，目前中國人在朋友、家人之間，什麼話都可以講，沒有什麼禁區。末了她還問：「你的文章不也是在國內媒體上大量發表嗎？」

對於我的著作與文章在國內發表之後的遭遇，我可以列舉出若干媒體因發表我的文章而受到整肅的事例。但將朋友、家人之間可以自由討論等同於言論自由與新聞自由，卻是個很大的誤解。我不只一次地對持類似誤解的人解釋：私人之間的自由談話與公共領域內的言論自由有實質區別。前者只表示在彼此信任的人之間一種意見交流，而後者才代表社會公共領域的言論自由。

最重要的是，這一見解還忽視了一點，那就是在蘇聯史達林鐵腕統治時期，蘇聯還有一種「廚房文化」，即家人坐在一起譏罵蘇聯當局的種種倒行逆施。而中國人現在這種私下裡可以批評時政，但在公共場合又被迫說假話的政治文化，只使中國人現在養成了一種兩面性格，隨時在不同的場合根據政治需要變換面孔。

看禁书就上禁书网：http://www.bannedbook.org/

誤解之四：中國老百姓不需要新聞自由

由於中國的媒體實行批准登記制，任何媒體都必須掛靠在黨政機關之下，讓黨政機關做主管與主辦單位，加上中國百姓無結社自由，這就使得中國百姓完全被剝奪了在公共領域內發言的任何可能性。這種現象外國人無從瞭解，而中國政府又常常代民立言，甚至聲稱中國老百姓素質太低，中國實行民主政治的條件還不太成熟，因此許多外國人常常問一個同樣的問題：「中國老百姓是否覺得經濟生活改善就已經足夠，不需要言論自由與新聞自由？」

這實在是太深的一種誤解。應該承認，毛澤東時代的極權政治與現在的新極權政治，當局者確實在利用權力剝奪人民的記憶並重構歷史。在這樣一個國度裡，政府對人、對思想的控制和操縱不僅能扭曲國民的歷史記憶，並且能夠使人民對人權、自由、民主等普世價值產生免疫力與抵抗力。在這種情況下，要求九億農民中的絕大多數闡述關於新聞自由的理念當然不太可能，但中國底層社會近十餘年來幾乎養成了一種將報社、電視臺等媒體當作申訴冤情之處，至少表明他們已經模糊地知道通過公眾傳播媒介幫助他們討公道，申訴自己的利益主張。這種投訴大多數時候無疾而終，但憤慨的民眾卻難免發出對傳媒的指責，譬如「你們也是吃官飯的，當然官官相護」之類。

而中國知識界對新聞自由與政治民主化之間的因果關係更是心知肚明，這些年來一直有不少人身體力行，為了披露一些社會真相、說一些真話而被中國當局無情整肅。為了讓人們瞭解中國記者

看禁书就上禁书网：http://www.bannedbook.org/

與知識界當中的良知人士為了中國的言論自由與新聞自由所付出的巨大代價，我在研究報告當中專門撰寫了「戴著鐐銬跳舞的中國記者」與「犧牲者墓園」。

願「冰點事件」成為中國人爭取新聞自由的契機

平心而論，在九十年代中後期，中國曾出現過一段言論管制相對寬鬆時期。當時，《南方周末》的大膽敢言一度在報業獨領風騷，而《書屋》等雜誌更是一度成為知識界人士發表前沿思想的陣地。與這些媒體相比，《中國青年報》的「冰點」所載文章並不算突出。只是上述媒體相繼遭到大整肅閹割之後，「冰點」以及後來開辦的《新京報》就成了韭菜地裡最高的那一撮韭菜。而這兩家絕不涉足政治，只涉足社會領域的報紙如今也被中宣部揮刀相向，說明了中國政府對輿論的控制日益加緊，已經收縮到讓人們無法再有任何騰挪餘地。

遭受整肅的媒體在中國幾乎無時無之。以往媒體受到整肅時，知識界往往有人說這是因為所刊文章言論太偏激，作者、編者不善於保護自己。這種心態說是「犬儒主義」也罷，說是「明哲保身」也罷，其結果使得中國政府日益肆無忌憚。

最近「冰點」停刊之所以能夠成為事件，一是「冰點」的編輯們憤起反抗；二是人們對中國政府控制媒體蘊藏的憤怒終於爆發，起而支援。更重要的是：這次「冰點」事件所刊文章，只不過是袁偉時教授幾年前發表於廣州《東方文化》雜誌上的舊文，網上多處

看禁书就上禁书网：http://www.bannedbook.org/

轉載過這篇文章，況且「冰點」一向以「持專業媒體人士立場」自許，立場言論相對溫和。在此情況下，一些中國知識界人士意識到自己緊接著可能成為韭菜地中最高的那一撮，終於選擇了反抗。

最近這幾年有一段話在中國被引用得最多，那就是「二戰」以後，馬丁・尼莫拉（Martin Niemoller）牧師為了讓人類社會永遠記住納粹屠殺猶太人這一血腥恥辱，在波士頓豎起了一塊紀念碑，碑上銘刻了這樣一段話：

「當初他們（指法西斯德國納粹黨）殺共產黨，我沒有作聲，因爲我不是共產黨；後來他們殺猶太人，我沒有作聲，因爲我不是猶太人；再接下來他們殺天主教徒，我仍然保持沈默，因爲我不是天主教徒；最後，當他們開始對付我時，已經沒有人爲我講話了……」

希望「冰點」事件能夠成為中國知識界爭取新聞自由與言論自由的一塊界碑。這是我，一位在政治高壓下被迫流亡的中國知識份子對母國知識界同仁的一點祈願。

看禁书就上禁书网：http://www.bannedbook.org/

看禁书就上禁书网：http://www.bannedbook.org/

霧鎖中國

中國大陸控制媒體策略大揭密

目錄 CONTENTS

《推薦序》

萬山不許一溪奔　國立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所長　張錦華　2

大陸傳媒何去何從　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系主任　馮建三　8

撥開那層政治的迷霧

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所長　王高成　14

真情告白，語重心長

前國防部少將軍事發言人・銘傳大學傳播學院教授　吳奇爲　17

《作者序》致臺灣讀者：

中國「媒體市場化」的神話褪色之後　20

前　言　雲遮霧罩的神秘中國　36

一、一些專家的感歎：

在中國待的時間越長，越不瞭解中國　39

二、中國的「媒體」是公共傳媒

還是政府的宣傳機器？　42

三、中國傳媒業（含出版業）

是怎樣處理「新聞」與敏感內容的？　46

四、觀察中國最重要的是「觀其行」，

而不是「聽其言」　56

看禁书就上禁书网：http://www.bannedbook.org/

五、中國當局為什麼總被美化？ 58
六、閱讀中國媒體的幾條重要經驗 61

第一章 控制新聞是愚民政策的主要手段 66
一、1978年以前中國新聞控制的演變與特點 69
二、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媒體管制 78
三、2003年的「新聞媒體改革」神話 84

第二章 政府對新聞媒體的控制 92
一、法律與憲法相悖 94
二、中國政府對媒體的跟蹤管理 95
三、重大事件實行「統一報導」 108
四、對媒體從業人員進行政治教育與思想控制 111
五、歷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長的命運 113

第三章 政府對媒體從業者的雙重控制 120
一、傳媒帝國的政治金字塔結構 122
二、傳媒政治等級在中國的現實作用 124
三、從中央電視臺「焦點訪談」
看中國當代傳媒的處境 128

看禁书就上禁书网：http://www.bannedbook.org/

第四章「內部文件」與資訊保密制度 134
一、無所不包的「國家機密」 136
二、剝奪民眾知情權的「內部（秘密）文件制度」 154
三、作為政治特權的「內部新聞」 157

第五章 戴著鐐銬跳舞的中國記者 164
一、中國政府對資訊源與記者採訪的嚴格控制 166
二、各地「礦難」發生後例行的新聞封鎖 168
三、用毆打記者的暴力方式阻撓記者採訪 174
四、地方公安局與法院發「文件」禁止記者採訪 176
五、政府收繳載有不利本地政府形象報導的報紙 182

第六章 封鎖消息與製造混雜著部分真相的謊言 186
一、中共中央宣傳部對
「希望工程」腐敗案報導的干預 188
二、製造混雜部分真相的謊言：「南京中毒案」 198

第七章 記者成了高風險職業 208
一、西安《各界導報》記者馮釗俠被殺案 210
二、《證券市場周刊》披露
李鵬（中國總理）家族暴富，作者被捕 212
三、山西記者高勤榮反腐敗受誣冤案 214
四、「中央文件彙編」竟然成了反動書籍 219

看禁书就上禁书网：http://www.bannedbook.org/

五、遼寧省記者姜維平揭露該省高層腐敗，
鋃鐺入獄 222
六、為什麼總是揭露腐敗者受到懲罰？ 225

第八章 犧牲者墓園 228
一、一朵被掐斷的帶刺玫瑰：《南方周末》 230
二、犧牲者墓園 246

第九章 外國記者在中國 254
一、「自由」的外國記者與不自由的被採訪對象 257
二、外國記者面臨的種種管束 259
三、中國政府對外國新聞報導的機會主義態度 263
四、在中國媒體工作的外國記者的遭遇 265
五、什麼樣的外國記者能成為
「中國政府的好朋友」？ 268

第十章 外商能否進入中國傳媒業？ 280
一、仍未開放的外商投資禁區：傳媒業 282
二、一些純屬虛構的謊言 285
三、嚴格控制境外媒體內容進入中國 287
四、外商投資中國媒體會給中國帶來新聞自由嗎？ 291
五、世界媒體進軍中國市場竟成南柯一夢 294

看禁书就上禁书网：http://www.bannedbook.org/

第十一章 中國政府對網路的控制 304
一、中國互聯網（網際網路）發展概況 306
二、中國政府對網路的嚴密控制 309
三、專制高壓下的「心理長城」：
中國網路的高度「自律」 312
四、中共政府的國家「駭客（hiker）行為」 318
五、透過網路監控抓捕「異議人士」 327
六、中國貢獻給世界的黑色幽默：
我們沒有網路警察這個警種 331

第十二章「老大哥」在看著你 338
一、「老大哥」監控著每一個需要被監視的人 341
二、與跨國公司建立不光彩的技術合作 342
三、網路大牌如何向中國政府叩頭
——Google在中國的經歷 347
四、龐大的現代科技監控體系：「金盾工程」 349
五、網路公司的集體辯護與美國朝野的譴責聲 353
六、一份說謊的網路調查報告 357
七、寬嚴之間見章程 360

第十三章 中國政府的意識形態「傑作」：冷戰意識 366
一、浸透冷戰意識的國際觀念 369

看禁书就上禁书网：http://www.bannedbook.org/

二、虛偽的意識形態宣傳
對中國社會道德的破壞作用 375
三、中國政府執導的傳媒「仇美愛國秀」 380
四、中國人為什麼對美國的「9・11事件」喝采？ 3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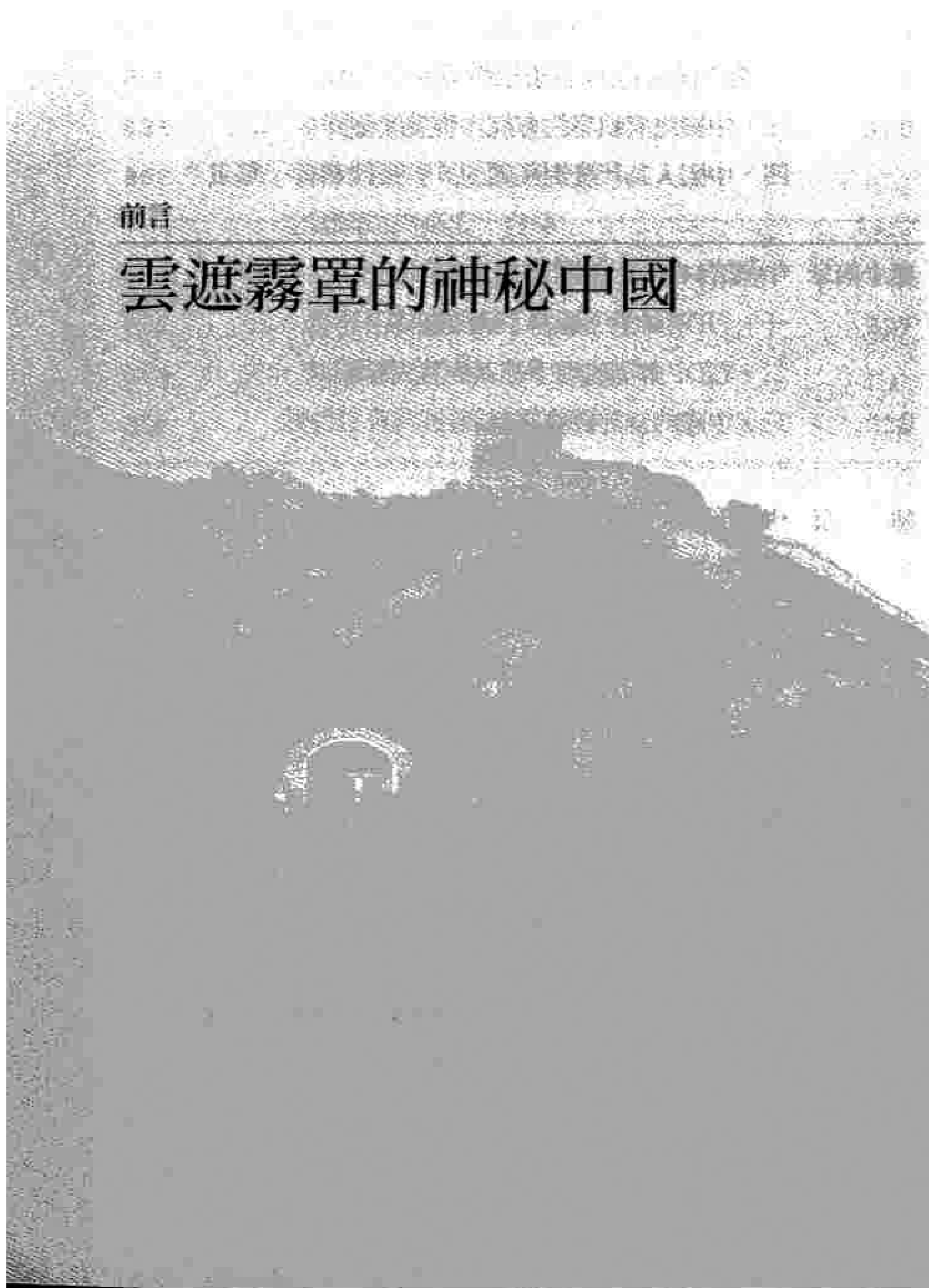
第十四章 中國的GDP高速成長神話 394
一、GDP神話，騙得了別人騙不了自己 397
二、GDP神話光環下掩藏的巨大陰影 406
三、中國的統計數據之謎 415

結　語 中國離民主政治還有多遠？ 424
一、中國的「變」與「不變」 426
二、墨寫的謊言塗飾著中國 431
三、中國離政治民主化還有多遠？ 435
四、一個民主的中國更能為世界文明做出貢獻 439

◎附錄《書評》

美國《紐約時報書評》
中國：刪減真相的國度 林培瑞／著 林培瑞・楊莉藜／譯 444
日本媒體之推薦 劉義華／整理・翻譯 460

看禁书就上禁书网：http://www.bannedbook.org/



前言

雲遮霧罩的神秘中國

看禁书就上禁书网：http://www.bannedbook.org/

中國當局控制媒體的目的簡單明瞭：對國際社會，永遠不讓他們知道這個國度裡正在發生什麼事情；對內則要讓人民因資訊不暢而處於互相隔絕狀態，喪失分辨事實與假象的能力，並無法形成集體抗爭力量。

看禁书就上禁书网：http://www.bannedbook.org/

世界早已成了一個地球村，人們瞭解其他國家的興趣越來越濃厚，媒體的報導自然成了人們獲取資訊的主要來源。人們借助媒體（現在得加上網路資訊）提供的各種資訊，構想他國景象。旅遊者們憑興趣一遊，對於各種資訊的真實性要求較低；但投資者對於各種資訊的要求則要嚴格得多，因為一旦判斷失誤，花一生心血積累的財富可能付諸東流。隨著中國成了世界矚目的投資寶地，有關中國的各種新聞與分析逐漸佔據著媒體越來越多的版面。（編者註：本書對於「中國」、「中國政府」等名詞之運用，係尊重作者的原著用語，並不代表出版者之立場，其所指「中國」即「中國大陸」，「中國政府」即「中共政權」。）

每個國家都向世界展示著它們各自的魅力。區別在於民主國家的媒體有言論自由，資訊雜然紛陳，呈多元狀態；而專制國家的媒體卻受到嚴格控制，必須隨著當局的指揮棒起舞，因此只有一種聲音。在「冷戰」結束以前，世界各大國當中，蘇聯與中國顯得最為神秘。但從上一世紀90年代以來，蘇聯的解體退下了蒙在鐵幕上的神秘面紗，而看似正在逐漸開放的中國，卻因其真實面目籠罩於神秘雲霧之下，總是讓世界感到困惑。

這層神秘雲霧，實際上是因中國政府嚴格控制媒體而產生。中國一直以外鬆內緊的方式嚴格控制媒體，將中國與世界主流價值不一樣的「異端」緊緊包裹在各種半真半假的資訊之中，使得中國從表面上看似乎與世界的主流價值正在接近。中國當局控制媒體的目的簡單明瞭：對國際社會，永遠不讓他們知道這個國度裡正在發生什麼事情；對內則要讓人民因資訊不暢而處於互相隔絕狀態，喪失分辨事實與假象的能力，並無法形成集體抗爭力量。可以說，中國的媒體是只被政府緊緊控制的「萬花筒」，國際社會只能通過這只

看禁书就上禁书网：http://www.bannedbook.org/

「萬花筒」瞭解中國。由於資訊的「萬花筒效應」，使得許多號稱「中國通」的專家們都認為「瞭解中國是一場挑戰」。

一、一些專家的感歎：在中國待的時間越長，越不瞭解中國

在世界眼光中，中國的13億人口意味著龐大的市場需求，因此瞭解中國成了開拓市場者們所必須。然而什麼才是真正的中國，卻實在讓國際社會莫衷一是。且不論中國為世界勾勒的「中國」是何種圖景，僅僅是國際社會，就有「崩潰論」與「繁榮論」兩種截然相反的看法，而且持兩種看法的論者都認為自己是正確的。

外國人瞭解中國為什麼如此之難？為什麼對同一個觀察對象會得出如此水火不容的印象？這一問題恰好是筆者多年來就關心的。1997年我在香港中文大學做訪問學者時，遇到一位美國的政治學教授，她那年正好發表了一篇關於中國鄉村選舉的論文，將這一問題帶入了英語世界的視野，從此這一選題成為許多研究中國的學者趨之若鶩的領域。在與這位學者交談時，我問她：「你認為自己在多大的程度上瞭解中國？」她很認真地告訴我：「80年代中期我到北京學習中文，從第二年開始，我認為自己懂得了中國，也懂得了中國人。但這種自信到了第5年以後慢慢減弱，因為通過媒體閱讀到的資訊與中國人私下告訴我的總是不一樣。到了第8年，隨著自己對中國的瞭解日益加深，我越來越認為自己並不真懂中國。」

類似的看法我還聽到其他的中國問題專家（至少他們在自己行業內獲得了如此評價）談過，其中包括一些在中國工作多年的高級外交官。一位在中國工作過8年的美國外交官曾對我談到：去中國

看禁书就上禁书网：http://www.bannedbook.org/

之前，曾經通過情報部門得到過一些有關中國的資訊。但到中國之後，他通過中國媒體報導得到的初步印象是完全否定來自美國的那些資訊。這種情況讓他困惑且無所適從，直到第三年他才開始明白：不能僅僅只通過中國的媒體瞭解中國。因為真實的情況可能與媒體上報導的正好相反。這位外交官幽默地說，「中國的媒體是只萬花筒，看起來很美好，但一切都是經過變幻處理的。」

一位曾駐中國5年的日本記者在採訪中對我談過：「我在中國看到的與聽到的情況，讓我感到中國經濟很繁榮，與你書中談的不一樣。我當然知道你的書在中國很受歡迎，但是你怎樣解釋我看到的與你看到的不一樣？你要能說服我，才能說服日本讀者。」於是我問這位記者：「我想請你告訴我兩點：第一，你有關中國的資訊來源有哪些？第二，你到過中國哪些地方，除了大中城市之外，去過農村沒有？尤其是去過政府限定之外的農村地區沒有？」這位記者告訴我：「我去過中國大多數省會城市，也偶爾搭上計程車看過一些城市的郊區，但我沒有去過離城市幾十公里之外的農村，也沒機會做調查；有關中國的資訊我有三個來源，一是通過中國的媒體，二是與中國政府各部門的官員接觸，三是從日本駐中國大使館瞭解。」於是我對這位日本記者說：「首先，這三個來源其實就是一個。中國的媒體是按照政府意旨進行宣傳，政府官員是政府的發言者。至於日本駐中國大使館的消息，其來源主要也是這兩個。而真正的中國，其實完全被這三個來源所遮罩了。其次，70％的中國人住在農村，你如果沒到過中國的農村，就等於並沒到過真正的中國。一些到過中國的外國人，包括部分中國人在內，經常拿中國的上海、北京、廣州、深圳等大城市與一些省會城市做例子，證明中國的繁榮發達，甚至還有人拿上海與紐約及東京相比，最後證明中

看禁书就上禁书网：http://www.bannedbook.org/

國的發展程度並不遜色。但恰好大部分中國人並不住在這幾個大城市裡，農村的面貌才是中國的真正面貌。有一句這樣的經驗之談：沒到過美國的鄉村不知道美國的富饒，沒到過中國的農村不知道中國的貧窮。而且有一點你們可能不知道，外國人在中國可以去什麼地方，不可以去什麼地方，是有法律條款加以限制的。你如果認為走馬看花式地走了一些地方就瞭解中國，那麼我已經來過日本三次，也到過日本的東京、京都、大阪、福岡等不少城市，參觀過一些企業、媒體，如果我告訴你，我已經瞭解日本了，並描繪出一個你們日本人完全不認識的日本。你能同意嗎？」在筆者對中國經濟詳加解析之後，這位記者最後承認，他所瞭解的中國確實不是全面。

越是深入瞭解中國的人，越是知道應該怎樣解讀中國。曾從事對華工作50年，並於1989年開始擔任過美國駐華大使的李潔明（James R. Lilley）先生在他的回憶錄中談到過自己的經歷，並舉出一位到中國參加一個合作專案的美國人比爾（Bill）為例。這位比爾先生因為自己到過中國（其實就是作為旅遊者走馬看花），以為已經瞭解中國，而且聽不進別人的意見，堅持認為自己主觀詮釋的「中國」就是真正的中國。李潔明先生談到，有比爾特點的絕對不止比爾一人，還有美國一些四星上將及其他各種人物。因為這類憑自己一管之見觀察中國的人太多，故此李潔明一再強調：「中國有許多令人費解、難測的地方。矛盾遍地都是，使得瞭解中國成為棘手的挑戰。」美國普林斯頓大學Perry Link教授的經歷，正好是美國懷抱理想主義熱情的左派青年的典型經歷。他年輕時因受馬克思主義的影響，深深嚮往中國的社會主義。這種因不瞭解而產生的嚮往與熱愛，最後卻因對中國的深刻瞭解而破滅，最終他成為對中國政府持堅定批評態度的人士，因而他的名字被中國政府列入禁

看禁书就上禁书网：http://www.bannedbook.org/

止入境的「黑名單」。

二、中國的「媒體」是公共傳媒還是政府的宣傳機器？

作為一位專門研究當代中國的學者，我當然知道認識中國之所以會如此困難，完全是因為政府控制與操縱媒體，並向社會提供虛假資訊所致。

一個人如果僅僅通過中國的媒體來瞭解中國，得到的印象肯定與真實的中國相去甚遠。我在哈佛大學、芝加哥大學等地演講以及在美國國會作證時都指出：被視為中國最權威的報紙是《人民日報》，被視為美國最權威的報紙之一是《紐約時報》。但如果某位讀者同時閱讀這兩張報紙任何一段時間的報導，肯定會得出一個與事實相去甚遠的結論：美國社會弊端叢生，治安狀況不佳，公民經常抱怨政府，總統更是不得人心，備受指責；而中國人則有如生活在人間天堂：政府勤政愛民，官員廉潔奉公，時刻傾聽下情；失業率低下，失業者也常得到政府關心愛護；人民對政府感謝不已，對國家領導人更是由衷熱愛，經常主動學習他們的講話與指示；雖然偶爾有點腐敗，但總是在中共中央的英明領導下及時得到糾正……。

其實，只要對這兩個國家的基本情況有所瞭解，就應當明白這一結論之荒謬。但產生這種荒謬的原因是什麼呢？關鍵在於兩國的媒體性質有著根本差異。美國的媒體奉行「新聞的專業主義」，這是上一世紀中葉美國政黨報紙解體之後在新聞同行中發展起來的「公共服務」的一種信念，其最突出的特點，是相信可以從非黨派、非團體的立場客觀地報導新聞事實，其目標是服務於全體人

看禁书就上禁书网：http://www.bannedbook.org/

民，而不是某一利益團體。因此，美國等西方民主國家的媒體只需要秉承媒體的幾個原則：尊重事實，秉持職業道德與良心。防止官員營私舞弊，監督與批評政界要人，討論各種正在出現或者可能出現的社會問題，都被視為媒體的天然職責。

美國新聞界有個名詞，叫做Muckraker（扒糞者），意為「專揭醜事的人」，這個名詞的發明者是美國第26屆總統西奧多・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他在任的20世紀初期，正是美國政界與實業界腐敗現象嚴重之時。當時一群記者不畏艱難，專門揭露腐敗現象，他們寫的報告震撼人心。羅斯福總統擔心記者們寫的報告會引發社會危險的不滿情緒，於是他向這些記者們開火，稱這些記者像英國作家約翰・布尼安（John Bunyan）所著《天路歷程》（*Pilgrim's Progress*）一書中的人物。這個人因揭發醜事有功，被請去天堂稱帝。然而這個人對獻給他的皇冠看也不看一眼，原來他只會手握糞耙，看腳下的汙穢。羅斯福總統認為這些參與調查的記者就像這個人一樣，亂扒汙穢，胡亂指責主要的實業公司，指責他們控制政界人士。

但這些記者們驕傲地接受了這「扒糞者」這個名詞。經過一段時間，他們所寫的文章引起了全美國對腐敗問題的關心，結果促使國會通過了新的法律，政府開始對存在多年的腐敗弊病實行更嚴格的控制。時至今天，「扒糞者」留下了一個獻身改革的傳統，而每一個社會總是需要責任心強的專揭醜事的人。「扒糞者」也早已不再是個貶義詞，成為美國新聞行業引以為傲的職業要求。

與此同時，西方的媒體還經常要遇到來自於媒體行業內部的批評，以及來自於全國新聞委員會與職業記者協會的批評監督。總之，民主國家媒體的生存環境完全不同於專制制度下苟活的中國媒體。

看禁书就上禁书网：http://www.bannedbook.org/

而中國的媒體則是由中共政府掌握控制的巨大宣傳機器，中共政府自己將其定位於「黨的喉舌」，意即新聞媒體必須為黨的利益說話，粉飾太平被視為新聞媒體的主要職責，至於什麼是事實並不重要，記者的道德良心必須讓位於中共政府的利益。中國的新聞記者們對此感到痛苦，曾編了一段打油詩來描繪媒體在中國的角色：「我（媒體自稱）是黨的一條狗，蹲在黨的大門口。黨讓咬誰就咬誰，讓咬幾口就幾口。」閱讀中國的報紙雜誌，最深的印象是這些報紙滿紙洋溢的那種對權力的敬畏與對權勢者的諂媚。香港回歸以後，這一特點也已經為香港一些報紙與雜誌維妙維肖地加以模仿。

然而，自從「冷戰」結束以後，俄羅斯等前蘇聯集團國家已經民主化，不再控制新聞輿論及學術研究；而中國媒體因其展示的「改革」形象與世俗化、市場化方向，使西方社會忽略了中國媒體作為「黨的喉舌」的性質，並產生一個誤解，將中國媒體「市場化」與走向新聞自由等同起來，雖然時有新聞媒體遭受整肅的消息傳出來，但人們卻總將其當作個案或者政府一時一地的控制行為，而不是一種體制化暴力。這一誤會相當普遍，筆者經常遇到由外國人提出的這類問題。

美國霍普金斯大學與中國的南京大學於80年代在南京合辦了一所「中美文化交流中心」，這地方如今已經成了美國有志於中國研究的語言與中國文化學習搖籃。筆者曾於2000年11月受邀到該中心講學。一位美國學生在提問時問了一個有趣的問題：「我看你們的報紙，上面總是談中國的政治經濟形勢大好，與你的研究有很大的差別。但是為什麼你的書在中國那麼受歡迎？這說明中國人相信你的分析。但如果報紙說的東西不可信，那麼中國又為什麼要辦這些媒體？」一位南京大學的教師當時非常激動地站起來說：「你

看禁书就上禁书网：http://www.bannedbook.org/

對中國政治還不瞭解，否則就不會問這樣的問題，中國哪有什麼新聞自由，媒體都是黨的喉舌，報紙上說的大都是謊話。」

這位美國學生生長於民主國家，不瞭解專制獨裁國家都有操縱媒體的天性。尤其是在中國這樣一個民眾素質不高且缺乏獨立思考能力的國家裡，控制媒體就基本上能左右國民的思想。

這位美國學生的問題已經有幾位受聘於中國媒體工作的美國人作了回答，其中一位是受聘於中國中央電視臺四頻道的美國人瓊・瑪爾蒂絲（Joan Maltese），她回到美國後，曾將自己在中國工作時的親見親聞寫成了一篇文章，題目叫做「中國的宣傳機器是如何欺騙世界的」（How China's Propaganda Machine Works）[1]。她在中央電視臺工作了好幾年，終於弄明白「冷戰」期間的一個常識：共產黨統治的社會主義國家裡沒有新聞自由，媒體就是一架不斷製造謊言的宣傳機器。有這種經歷的西方記者還有好些，將其經歷寫出來的就有好幾位。

真正的問題在於：受到蒙蔽的外國人總還有覺醒的一天，因為他們從小養成的價值觀與是非標準讓他們對事物還有起碼的識別能力。但在所謂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教育與媒體宣傳灌輸下成長起來的中國人，有不少人喪失了分辨事實與假象的能力。更可悲的是，中國政府一直努力灌輸的意識形態還讓他們堅信：只有他們的判斷是正確的。這一點將使中國人在覺醒的路上步伐遲緩。一位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修博士學位的中國姑娘，其博士論文選題是分析中國1950年代的《人民日報》，她做得非常努力，並且得出了一個讓全世界都吃驚的結論：「中國1950年代的報紙基本上真實地反映了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情況」。她的論文計畫未獲通過，論文指導教授委員會做的結論是：這位學生連分辨事實的能力都沒有，因此不

看禁书就上禁书网：http://www.bannedbook.org/

具備任何研究能力。

這位姑娘出生於1960年代中期，其父母是軍隊幹部。她在中國得到的知識主要來自於中國政府統一編寫的教科書。而在中國政府統一編寫的教科書裡，所有的歷史都塗飾了厚厚的謊言，尤其是與中國共產黨有關的歷史更是如此。2001年7月，中國當局在北京的中國革命博物館舉辦「中國共產黨建黨80周年光輝歷程展覽」，在這個展覽裡，不但看不到1989年「六四事件」，甚至看不到對「文化大革命」、60年代初大饑荒、1957年「反右派」等由於「黨的錯誤」造成的巨大歷史災難的最一般、最簡略的敘述。在中國共產黨那裡，歷史已經被完全「敘述」成了另外一副模樣。

古羅馬政治家西塞羅（Cicero）曾說過：「一個人如果對自己出生以前的歷史毫無所知的話，這個人就等於永遠沒有長大。」（Not to know what has been transacted in former times is to be always a child.）這位姑娘是中共意識形態教育與宣傳的受害者，我相信她之所以選擇這個題目，一定是想用她的「研究」證明「國際反華勢力」對中國的描繪是相反的，要按照毛澤東說的「將顛倒了的世界重新顛倒過來」。她，以及與她相似的中國人之最大悲劇在於：他們甚至不知道自己是錯誤的。在這位姑娘看來，論文題目被否定只不過是「國際反華勢力」在學術界對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中國的一次「思想圍剿」。

還能有什麼事情比這種對本國歷史的完全無知，或者完全顛倒地去認識更讓中國人感到恥辱呢？

三、中國傳媒業（含出版業）是怎樣處理「新聞」與敏感內容的？

看禁书就上禁书网：http://www.bannedbook.org/

且不說中國人是否享有言論自由，僅僅是知情權一項，中國人就被嚴重褫奪。中國人看到的新聞經常是被肢解與過濾的殘破新聞。譬如2003年7月1日香港50萬人民舉行反對「二十三條立法」[1]的大遊行，震動世界，國際媒體爭相報導，而中國所有的電視、電臺、紙質媒體卻都保持可恥的沈默，不置一辭，而在此日期之前的報導更是只有「香港人民擁護二十三條立法」的消息。即使是號稱總部設在香港但在中國能夠收視的鳳凰電視臺，也因懼怕審查而保持沈默，只能在若干天之後在轉播別的新聞時插播一兩句而已[2]。2003年9月13日至15日德國總統約翰內斯・勞訪問中國，相繼在清華大學、南京大學和復旦大學舉行了三次演講，在演講中提出了人權、新聞自由與資訊自由等中國政府嚴厲禁談的問題，照例被中國政府所封殺，只能見之於德國媒體[3]。2003年12月10日，溫家寶總理訪問美國哈佛大學，中國大使館照例阻止列在中國政府「黑名單」上的數家媒體進入會場採訪，直至美國國會廣播委員會加以干預，才有一家媒體（自由亞洲電臺）獲准入場。而演講期間，一位美國女學生因呼喊「給西藏自由」，而被在場的三位中國女士奪去標語並「請」出會場，中國對這次演講的所謂「現場直播」也因此中斷一段時間[4]。

此類事例甚多，不勝枚舉，這裡只分析幾件牽動世界的大事。

---

[1] 「二十三條立法」，指的是自2002年開始，中國政府試圖在香港以立法的形式限制新聞自由，加強輿論管制。該立法的主要內容是將中國大陸壓制言論自由的幾條罪名，如危害國家安全罪、洩漏國家機密罪、陰謀顛覆政府罪，再加上一條為香港特設的「陰謀分裂領土罪」，以法律形式剝奪香港的新聞自由與言論自由。此舉遭到香港各階層的強烈反抗，中國政府被迫暫緩立法。

看禁书就上禁书网：http://www.bannedbook.org/

通過這幾件事情，讀者可以知道中國媒體是如何「尊重」事實的。

1. SARS事件

2003年2月開始，世界尤其是亞洲地區籠罩於怪病「SARS」陰影中，而SARS的源頭中國大陸卻對疫情的真實狀況諱莫如深。從2002年11月中旬廣東佛山開始出現第一個病例，到2003年2月初數百人被感染這段時間，中國廣東省政府一面按照慣例壓制媒體對實情的報導，另一方面透過政府內部管道上報中共中央最高領導層，但北京方面當時正值中共「十六大」權力交接時期，維持表面上的安定是第一要務，中共高層領導根本無心過問疾病流行這類事情（因為區域性的疾病流行在中國是常事），於是習慣性地掩蓋疫情，對外則矢口否認SARS的發源地是中國，從而讓整個國家失去了寶貴的防疫時機，最後導致SARS傳播至世界範圍，與中國大陸毗鄰的香港更成了SARS肆虐之地。

在這段時期內，中國百姓從官方傳媒那裡得到的有關SARS的資訊與國際社會完全不相同。根據廣東一位新聞記者的披露，面對SARS的肆虐，廣東省一位官員居然說出如此驚人之言：「疫情不可怕，可怕的是媒體」。其言下之意是：如果疫情失去控制，還可以通過控制媒體來封鎖消息；而如果失去了對媒體的控制，那比疫情失控更可怕。在這種思路的指導下，中國政府對媒體與輿論的制約、干預「力度」之大可想而知。

中國記者對SARS的報導其實早在2002年11月剛出現疫情時就開始了，但一直受到廣東省宣傳部門的干預。2003年2月份（中國的春節期間）SARS隨著香港人到大陸過春節而傳播至香港，此事在香港已經鬧得人心惶惶，引起恐慌。但從2月8日開

看禁书就上禁书网：http://www.bannedbook.org/

始，中國政府的宣傳部門不斷下達各種禁令，聲稱疫情已經得到控制，並要求媒體從社會穩定的立場出發，不得採訪報導此事。據廣州一位資深編輯稱，從這天起，有關部門針對「非典型肺炎」（中國對SARS的稱呼）的通知就沒有停止過，最多的一天達到三道[5]。當海內外逐漸瞭解到SARS的源頭在中國時，廣東省政府於2月11日卻召開記者招待會，聲稱疫情公布沒有「緩報、漏報、瞞報」現象，被稱為病源的廣東省廣州、佛山、河源、中山等四個市「已無新發病例報告，全省疫情已經得到有效控制」。在這次記者招待會之後，中共廣東省委分別於當天、2月14日與17日，多次以書面與口頭通知的方式，警告全省各媒體，不要擅自報導有關SARS的任何消息，有關報導一律採用官方提供的宣傳稿。與此同時，官方更將有關SARS的統計數字列為國家機密，洩漏者一律按洩漏國家機密罪行處理。僅僅在廣東，因為報導SARS而受處罰的媒體就有數家，最先被用來祭旗的是廣東的《二十一世紀環球報導》，因這家報紙隸屬於《南方日報》集團，由此株連至《南方日報》集團旗下各報，中共廣東省委乘機改組他們早就視為眼中釘、肉中刺的《南方周末》[6]。

然而，該部門的禁令只堵住了媒體的嘴，卻堵不住社會的口耳相傳，從官方媒體那裡得不到可靠的消息，社會上各種流言蜂起，出現了罕見的恐慌性搶購。在媒體的強烈要求下，中共政府的宣傳部門作了「讓步」，安排刊發「通稿」[ii]，但「通稿」內容語焉不詳，沒能得（起）到安定人心的作用。直到4月8日，解放軍301醫院（解放軍總醫院）的退休軍醫蔣彥永冒著極大的危險投書美國《時代周刊》駐中國記者Susan Jakes——此信原來是寫給中央電視臺4頻道與香港的鳳凰電視，未獲答覆，這才通過人轉投給《時

看禁书就上禁书网：http://www.bannedbook.org/

代周刊》記者——將他所瞭解到的SARS疫情透露給國際媒體，國際媒體才算是有了第一手的資料[7]。

在這段情況最緊急，最需要政府承擔防疫責任的時期，中國政府卻完全未採取任何行動去防止疫情的擴散。那麼這段時期中國政府究竟做了些什麼事情呢？

一是將SARS的病源說成是美國。2月11日，廣東省衛生廳廳長黃慶道在接受媒體訪問時指出，SARS並不可怕，可以治療，也可以防治。即使在美國這個醫學發達的國家，每年也有560萬非典型肺炎病例，其中住院死亡率達13%。與美國相比，廣東省有7,000萬人口，目前發病的比例是很小的[8]。此後的50天是疫情控制的關鍵時期，中國政府除了繼續敷衍塞責，向國際社會提供假情況之外，幾乎什麼也不做[9]。正是在此階段，SARS傳播至香港，並經由香港傳向新加坡、臺灣和加拿大等地，引起世界輿論的嚴厲譴責。直到4月4日，中國政府才在世界輿論的壓力下派國務院副總理吳儀到中國疾病防疫中心調查，第二天被迫承認中國確有SARS出現[10]。

根據中國媒體後來陸續發布的資訊，其實早在1月21日，中共高層領導就得到廣東省透過政府內部秘密管道送上來的疫情報

---

ii 「通稿」是「內容統一的通用稿件」之簡稱，為中國傳媒業一個政治術語。由於中國政府控制傳媒，在政府認為重大問題上的新聞報導，中央政府一般是以新華社名義發布一篇新聞稿，謂之為「通稿」，全中國所有媒體關於這一問題的報導都必須按照這篇「通稿」給定的內容發表，不得超越這一範圍，否則就被視為「政治錯誤」，受到懲罰。其餘有關各政府部門的重大問題則由該部門發給記者通稿。各級宣傳部門也經常以發布「通稿」的方式對新聞工作進行「指導」。

看禁书就上禁书网：http://www.bannedbook.org/

告，此後一個月內也派出衛生部的專家們三次去廣東取樣回北京分析。這說明中國政府高層非常清楚疫情的流行，只是中國政府從未將知情權作為公眾的天然人權，壟斷資訊並堵絕任何「負面消息」的流傳是中國政府控制新聞輿論的主要目的。

二是拒絕與世界衛生組織合作。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早在3月15日就拿出了有關SARS的全球疫情報告，並指出SARS「看來是21世紀的第一種嚴重和易於傳染的疾病」[11]，並向中國政府提出到疫區觀察的要求，但中國政府足足讓WHO等了兩個星期，直到4月2日，才允許WHO派員前往廣東。而這一時期，中國政府為了逃避WHO的檢查，要求北京一些醫院將SARS病人放在救護車上拉著在全北京城亂跑。直到疫情高潮過去，世界衛生組織都一直對中國政府提供的病情資料表示懷疑[12]。

三是迅速立法，將傳播SARS資訊定為「傳播謠言」，聲稱將予嚴懲。中國政府被迫承認SARS疫情之後，對國際社會承諾此後將每天公布疫情的真實數字。但這種承諾無非是對外欺騙而已。5月中旬，SARS正由北京向全國擴散，各種流言隨著北京的外地民工紛紛回鄉不脛而走。於是中國各地政府開始抓捕「傳播SARS謠言者」。所謂「謠言」，其實就是與中共官方版本不一致的消息[13]。事實上，根據在疫區的人士觀察，中國政府公布的疫情新聞與實情差距太大。一些人冒著被政府逮捕的危險向北京電臺、《南方周末》、鳳凰衛視等媒體披露真實情況[14]。中共政府還用殺一儆百的方式懲罰了《中國青年報》及其下屬《青年參考》的兩位編輯與一位記者[15]。用這種「抓謠言」的方式限制言論自由與民眾的知情權，當今世界上恐怕只有北韓和中國等少數幾個極權國家還在實

看禁书就上禁书网：http://www.bannedbook.org/

行，這真是對人權的一種極大褻瀆。

最滑稽的是中國政府如同變色龍一般的表現：開始是隱瞞疫情，繼而又找出兩隻替罪羊（衛生部長張文康、北京市委書記孟學農）來洗刷中央政府的嚴重過失，最後又將自己打扮成「率領全體人民抗擊SARS的英明領導」。

2. 希拉蕊．克林頓（Hillary Clinton）回憶錄中文版被刪改風波

2003年8月下旬，美國前第一夫人希拉蕊．克林頓的回憶錄《親歷歷史》（Living History）中文版在中國出版，異常暢銷，一個月內已印刷至少4版，總銷量售超過20萬冊。不過，中國讀者或許沒想到，他們看到的中文版至少有10處被刪改，這些改動甚至沒有及時通知版權所有者——美國出版商「西蒙與舒斯特出版集團」（Simon & Schuster）。

據美聯社報導，有關刪改主要涉及美籍華裔人權活動家吳弘達以及1989年的天安門民主運動。西蒙與舒斯特出版集團已在其網站上專門設置一個頁面，將中文版的改動做了標識，為了方便中文讀者閱讀，該網站專門附上了英文原文和對應的中文翻譯。例如，中文版中有一處稱吳弘達在中國被捕，因間諜罪等候審判，但英文版原文是：吳弘達是一名「人權活動家，作為政治犯在中國勞改營被關押了19年」。據該網頁顯示，英文版共有10頁被刪改，刪改之處集中在兩章，分別是「婦女權力是人權」（Women's Rights Are Human Rights）這一章當中的第298、299、300、301、302、304、306和308頁，以及「想像未來」（Imagine the Future）這一章當中的第457、460頁。其他一些章節，譬如描寫

看禁书就上禁书网：http://www.bannedbook.org/

希拉蕊的中國之行，前總統克林頓與中國領導人的會晤，中國政府壓制媒體，鎮壓西藏和政治異見分子等，都被刪短或修改[16]。

據《紐約時報》披露，希拉蕊對這些修改表示「吃驚和憤怒」，她和西蒙與舒斯特出版集團已致信出版該書中文版的譯林出版社，要求收回已經發行的中文版，重新依照英文原文翻譯。譯林出版社則以時間緊迫，來不及同美國出版商聯繫並告知他們這些改動為由，承認是「失誤」，但又表示這些修改只是微小的「技術性修改」，不影響書的完整性[17]。中國青年作家余傑將該書的大陸中文版與臺灣時報出版社出版的中文版作了仔細對照，發現這兩個中文版本之間的差別相當大，余傑撰文逐項羅列兩個譯本之間的差別，任何一位中文讀者看了余傑的分析後都能很清楚地知道，中國的譯林出版社所犯的絕不是「技術錯誤」，而是故意更改文義。余傑的結論是：「經過這樣的一些巧妙的處理，希拉蕊的回憶錄已經面目全非了。大陸的編輯和新聞檢察官們都是圖書整容手術的高手，他們能夠讓每一處的刪改都不留痕跡。我不得不戳穿他們的把戲，我不接受這種對讀者智力的侮辱和對讀者自由的侵犯[18]。」

希拉蕊自傳《親歷歷史》被刪改一事，讓國際社會頗為失望，人們不得不注意到這一事實：雖然中國的大眾傳播媒體，包括中國的出版社已經相當市場化和商業化，但依然受到中國執政黨共產黨和政府的嚴密控制和審查。此後經過將近4個多月的談判磋商，譯林出版社未對此做出任何讓希拉蕊及其出版代理滿意的答覆，2003年12月24日，西蒙-舒斯特出版社向譯林出版社發出正式信函，取消譯林在中國大陸的《親歷歷史》出版權，並要求譯林銷毀庫存的擅自刪節的印本。代表克林頓夫婦談判其書籍在外國出版事宜的律師羅伯特・巴奈特表示，鑑於《親歷歷史》在中國出版的不

看禁书就上禁书网：http://www.bannedbook.org/

愉快經歷，今後克林頓和其他西方作者可能會要求事先審核中國出版社的譯文，然後再最終授與中國出版社出版權。在過去，中國的出版社在出版外國書籍的過程中沒有這種外方的事先審核[19]——這一要求其實只是美方出版代理保存體面的做法，按照中國的現實情況，這本書將會在市場上繼續銷售，而出版社與政府都會解釋成這是「盜版」，並承諾他們會「盡力打擊盜版行為」。但真正的事實則是：只有等這本書根本銷不動了，這本書才會在中國圖書市場上絕跡。

中國政府對這一事件始終裝聾作啞，宣布這是「企業行為」，與政府無關。這當然是遁辭，因為多年來對翻譯著作中有關中國與社會主義的部分進行刪改，幾乎是中國出版界約成俗定的做法。這當然是出版社在多年言論管制下形成的反應，因為不這樣做書就會被查封，出版社將被關閉。在就業艱難的今日中國，為了出一本書而導致出版社關門，會招致同事的集體怨恨。卡爾・波普的名著《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一書的上卷在80年代中期就已經出版，但因其下卷內容尖銳批判馬克思主義與社會主義制度，在中國始終未能出版，中國的學者想看全本的書，必須購買臺灣版本。美國學者托馬斯・伯恩斯坦（Thomas Bernstein）1977年出版的《上山下鄉》（*Up to the Mountains and down to the Villages: The Transfer of Youth from Urban to Rural China*）[iii]，1993年在中國翻譯出版，但無論是書中章節小標題還是書名，都已經被偷樑換柱，改

[iii] 上山下鄉，這是發生於1963～1974年一段中國的慘痛歷史。因為當時中國無法為城市青年提供任何就業機會，以政治運動的形式將3,000萬青年男女送往農村與偏遠山區。這場人口大遷徙當中，發生了許多悲歡離合的痛苦故事。

看禁书就上禁书网：http://www.bannedbook.org/

得面目全非，而且那時連版權都未購買[20]。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森（Amartya Sen）的名著《以自由看待發展》（Development As Freedom）在2002年在中國出版時，因為書中談到中國1959年至1961年的三年大饑荒時，批評了毛澤東的專制政府對人民極端不負責任，並多次談到言論自由與多黨制民主對促進民主的重要性，該書中文版在出版過程中先是被反覆審查，繼而被刪改得面目全非，譬如「言論自由」被「更多的發表意見的機會」這類詞句所取代，「多黨制民主」被刪去或用一些與原來意思相去甚遠的詞句代替。當作者與譯者共同對此表示不滿時，編輯的回答是，他們面對一個政府宣傳部門頒發的禁用詞清單，不得不作如此修改[21]。這一次僅僅只是因為希拉蕊這位作者的「特殊性」，刪改作者文字才演變成一場風波，絕大多數作品的中譯本被刪改，幾乎就如一片樹葉飄落在水面上，連一絲波紋都未曾蕩起。

最能讓人們瞭解中國政府在尊重新聞自由方面口是心非的行為是如下事實：早在1992年，中國政府就在伯爾尼版權公約上簽了字，2001年中國加入WTO時又再次承諾要遵守國際規則。對於注重人情關係的亞洲國家來說，還應當看到一點：克林頓政府時期曾刻意軟化美國的對華政策，如果按照亞洲價值觀的思維，中國方面應該對希拉蕊「特殊照顧」一些，但事實卻給了相反的結論。無論如何，擅自刪改希拉蕊的回憶錄不可能不被發現，但在中國政府看來，外國的觀點，即使是與中國關係良好的美國前總統夫人希拉蕊的觀點，只要不合中國政府的言論尺度，就必須刪改，控制中國公民的思想才是最重要的。

看禁书就上禁书网：http://www.bannedbook.org/

四、觀察中國最重要的是「觀其行」，而不是「聽其言」

如果僅僅是聽中國政府自己的宣稱，中國現在一定已經躋入世界上最親民、愛民、重民、最為人民利益著想的國家行列，如果中國現在還沒有進入現代民主國家行列，主要是兩個原因所造成，一是西方國家的「資本主義民主」是假民主，而中國此刻正在實行的「社會主義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2005年10月19日中國政府發布的《中國的民主政治建設》白皮書，就再一次強調上述觀點。二是中國民眾的「素質太低」，這決定了中國目前還不能實行民主政治，中國人民必須在「英明偉大」的中共政府領導下慢慢成熟長大，直至具備政府認可的能夠參與民主政治的素質為止。溫家寶2003年12月10日在哈佛大學演講中，仍然繼續堅持「貧困者不能享有民主論」，只不過包裹得更為精巧一些而已。

中國政府認為，基於如此「特殊國情」——這一特殊國情是中國政府與御用學者們多年來反覆向國際社會論證的主題——中國現在正在進步，「中國的民主深深植根於中國大地。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是歷史的選擇、人民的選擇，符合當代中國社會發展進步的需要，符合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西方輿論對中國的民主政治建設持有偏見的主要原因，是他們以西方的民主標準來衡量中國，對中國蓬勃發展的民主政治建設視而不見。」[22] 再則，人權、民主，這是中國的內政，美國要干涉，政府就組織人民上街遊行抗議去！

上述概括讀起來像「黑色幽默」，但確實是中國近十餘年來的宣傳主題。國際社會曾經對中國的未來提出了兩個假設：一是經濟的發展會促進政治民主化；二是加入WTO以後中國會逐漸改變國

看禁书就上禁书网：http://www.bannedbook.org/

內的專制政治。由於相信這兩個假設能成立，許多外國觀察家斷定中國社會正在邁向民主化，所以對中國政府的態度比「冷戰」時期對蘇聯的態度友好得多。除了深知中國言論自由狀況的國際組織，如「記者無疆界」、「保護記者協會」與「世界人權觀察」等，關注中國人權狀況的國際媒體和國際組織現在並不多。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在中國因言論獲罪的罪名越來越多，明文列入《刑法》的就有煽動分裂國家罪（第103條），煽動顛覆政府罪（第105條），煽動民族仇恨、歧視罪（第249條），煽動群眾抗拒法律實施罪（第278條），這四條主要針對媒體及言論自由而來。《國家安全法實施細則》第8項第2條所寫「發表、散佈文字或者言論，或者製作、傳播音像製品，危害國家安全的」，就是指使用出版物或者其他傳播媒介「煽動犯罪活動」。

如果沒有新聞自由與言論自由，中國的政治制度就仍然是極權體制。從種種社會控制的手段來看，中國的共產黨政權從頭到腳發散的都是極權政治的氣味。它與史達林體制及毛澤東時代的極權體制之間，存在著不可否認的血緣關係。過去20多年來唯一的變化就是，毛澤東時代對極權體制是公開的自誇自贊，而1978年改革以後則演變成了說一套，做一套的國家機會主義。目前中國當局表面上宣稱中國「正在推進民主化進程」，要「建設社會主義法制，依法治國」，但實際上仍沿襲舊制，政治控制從外表上看起來鬆弛一些，但骨子裡卻沿襲毛時代的做法。但這種說一套做一套的虛偽做法，與其說其欺騙性很大，還不如說與中國有商業關係的跨國公司等利益集團願意相信這些說法。

在極權制度下，謊言與暴力是政府實施統治的主要方式，政府的言論是不可信任的，只有仔細觀察政府行為和社會真相，才能準

看禁书就上禁书网：http://www.bannedbook.org/

確判斷在中國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中國的聖哲孔子曾說過，觀察人的品行應該「聽其言，觀其行」，即考察一個人的品行，不僅要聽這個人說什麼，還要看他怎樣做。對於長期以來依靠謊言統治的中國政府，更應該看它怎樣做，它對人民的承諾有多少是實現了的。只有掌握了這一標準，觀察中國才會找到一個不至於太離譜的角度。

五、中國當局為什麼總被美化？

與「冷戰」時期的蘇聯共產黨政府相比，中國共產黨政府在國際社會的境遇其實要好得多。國際社會現在有一個很奇怪的現象：對民主國家的政府是按照民主政治的原則從嚴要求，但每逢評價中國政府，標準立刻就自動降低。每逢中國政府有什麼承諾，不管這些承諾是否每年都要重彈卻從不見落實的老調，國際社會必然一片讚頌聲音。譬如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召開前夕，中國政府再次重複每年都要表達的反腐敗決心與訪貧問苦活動，這都被國際媒體解釋成中國的「新政」。

就在2003年，國際社會一些媒體曾製造了兩個神話，一是宣稱中國要實行新聞媒體改革，另一個是中國準備推行憲政改革。第一個神話因8月份中國政府頒布了一個法規性文件而告結束，那個5,700字的《實施細則》的目的在於加強黨對媒體的控制，中國媒體從業人員都明白，「媒體業的冬天真正開始了」（詳細內容見第一章）；而第二個神話「憲政改革」更是一度被吹成一個大肥皂泡，2003年3月「十六大」後一段時期，一些觀察家們仍然習慣性地將中央政府無所作為歸結於江澤民對胡錦濤的制衡，但就在許

看禁书就上禁书网：http://www.bannedbook.org/

多媒體與中國觀察家們一致認定胡溫領導的中國政府將會實行憲政時，中國政府卻由中共中央下令關閉了四個討論憲政的網站，這4個網站是www.caosy.com、www.libertas2000,net、www.xianzheng.net、www.cc-forum.com[23]，關閉的理由仍然是中國政府的「冷戰」思維使然。中共中央書記處在一份檔案中指控「外部敵對勢力」滲透中國實行「和平演變」，為國內一些人士提供資金資助，鼓勵國內就政治體制改革和憲政問題進行辯論。

這種情況實際上揭示了中國政府正在走著與民主憲政相反的路：民主憲政的本質就是民眾參政議政，而民眾參政議政的前提就是要開放新聞媒體，讓人民有言論自由。既然中國政府連民間人士邊緣性的討論都要禁止，政治民主化又從何談起？不允許民眾參與的政治能通向真正的憲政改革嗎？

儘管中國政府的所作所為總是讓一些熱情讚頌中國改革的人士的預期落空，但這絲毫沒有降低他們繼續歌頌的熱情。十六屆三中全會的公報出來後，裡面沒有任何文字涉及政治體制改革，但美國著名的《商業周刊》還在評論「有更多的證據表明，胡錦濤有可能像前蘇聯領導人戈巴契夫那樣，釋放出引導中國實現真正改革的力量」[24]，至於那些實際上由中國政府贊助的中文媒體更是將馬屁拍到了極點：「胡錦濤有一個政治體制改革的夢」。可以毫不誇張地說，近些年來，中國政府已經成功地用市場與商業利益作為誘餌，讓世界各國政府紛紛變成了「擁抱熊貓者」，並成功地在各國培養了一批中國專制政府的辯護者。如今國際社會反對中國專制政治、批評中國人權的人士所要面對的往往不是中國政府，而是他們本國的專家學者與政治家們。

筆者一直不理解為什麼在對待前蘇聯與中國的態度上會有如此

看禁书就上禁书网：http://www.bannedbook.org/

差別。但被迫辭國僑居海外後，對海外媒體及「中國的國際友好人士」尤其是「愛國華僑」們有了近距離觀察的機會，在經歷了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情之後，我終於理解了一點：前蘇聯實行的是「鐵幕」政策，與歐美國家沒有多少經濟交往，無重大利益關係牽涉其中，自然也就無需美化這個國家。而中國現在與歐美各國的經濟來往越來越多，各國與中國均有利益關係。中國的人權狀況之糟糕，讓各國政府面臨壓力：怎麼能放棄人權這樣的人道原則與這樣的專制國家打交道？但如果要過問中國的人權，勢必引起中國政府反對，指責這是「干涉內政」。在利益權衡之下，國際社會各利益集團認識到自己需要中國這個市場，這交道非打不可，最好的辦法就是美化中國，不管事實如何，指出這個國家正在進步，行將告別專制就可以證明自己在政治上是正確的。這樣做，等於向世界宣示自己不是在與魔鬼打交道，多少也可以撫慰自己的良心。至於有些非常活躍的「愛國華僑」，早已經成了依靠中國共產黨養活的人，是中共政府在海外活動的週邊力量。2003年在美國被炒得沸沸揚揚的「陳文英間諜案」，案中的女主角陳文英就是舊金山（San Francisco）的著名「愛國華僑領袖」。

評論上述情況多少有點令人感到沮喪。利益第一，這是人類社會永遠的現實原則，這有二戰前歐洲國家對德國的「綏靖政策」作為先例。美國一家大投資公司的總裁曾託他的下屬問過我：「我知道中國市場將來必然出問題，因為政府實在太腐敗。但現在的情況確實很吸引人。我們先進去投資，再在未衰落前撤出。這個主意是否可行？」我的回答是：「這主意聽起來很美妙，有這種想法的人也非常多。但前提是你得確保自己能夠選擇最好的時機，並在最好的時機前撤出來。」

看禁书就上禁书网：http://www.bannedbook.org/

六、閱讀中國媒體的幾條重要經驗

毫無疑問，媒體（現在還包含網路資訊）是現代人獲取資訊的基本手段，許多人雖然知道中國媒體消息不太可靠，但卻無法辨識其中真假。我遇到過的外國人當中，就有不少人曾這樣問過我：「我們要怎樣才能瞭解中國？」我思索了許多年，能夠提供給讀者的經驗是三條，一是憑藉自己多年觀察累積而成的常識理性，二是憑藉常識從媒體的字裡行間找出真實的資訊，三是以「內部人」的方式進入中國人的日常生活，從中觀察真相，而不是以某種官方或外國人的特殊身分去「調查」得到的資訊，因為這種調查往往受到控制，流於形式。

常識需要長期生活在一個社會裡才可獲得。作為「外來者」與「內部人」的經驗也完全不一樣，幾乎具有不可替代性。當我在國內受整肅時，一位曾做過中共地委書記的退休官員對她的女兒（我的一位同事）說：「這位學者肯定是好人。據我這麼多年的經驗，共產黨說哪個知識份子反動，哪個知識份子就是好人；共產黨查禁哪本著作，哪本著作肯定就是好書。你一定要好好對待這位學者。」這位退休官員作出如此判斷，就是根據他在中國官場多年打滾獲得的「常識」。但學會閱讀中國的媒體，並瞭解如何作出判斷，卻是可以與他人分享的重要經驗。在此我想向讀者貢獻幾條重要的常識：

第一，對災情、治安、腐敗等一切所謂「負面消息」，閱讀時可以將情況設想得嚴重很多。因為中國的「宣傳紀律」是報喜不報憂，每一次災情都要嚴格控制對災情實際受害情況的報導，如規定報導的死亡人數不得超過幾人（不管事實上死了多少人），甚至災

看禁书就上禁书网：http://www.bannedbook.org/

情損失彙報都成了中共表彰自己的官員們的機會。最近的例子是2003年11月湖南衡陽一處住宅因大火坍塌造成傷亡，完全是建築物不合質量要求造成的災難，卻被中國的媒體變成了讚揚官員們如何親臨救火現場指揮、武警戰士如何勇於犧牲的故事。各地礦難頻繁發生，隱瞞死難人數，讚揚官員們如何關心搶救礦工生命更是各地媒體反複彈奏的老調。

第二，學會從反面理解一條消息。譬如當中國的媒體說政府關心失業工人問題時，大可以把這樣的報導理解成失業問題非常嚴重。如果媒體說某領導談一定要關心「農民問題」，就可以理解成農民已成為社會上最嚴重的問題並且已經影響到社會生活各方面，成了一個領導者不得不表示「關注」的問題。什麼時候中國的報紙上講要「搞好廉政建設，整頓黨風」，就說明這一時期貪汙腐敗之風已經非常嚴重。又如，當媒體強調要加強某高級領導人在黨內與中央的領導地位，要加強黨內團結，那麼就一定是某位領導的地位不太穩固，而且黨內出現了一些分裂，其領導地位已經受到威脅。

對於一個未長期生活於中國的外國人來說，認識中國確實是一場挑戰，但願這本書能夠幫助讀者找到一把瞭解中國的鑰匙。

---

1 Special for Newsmax.com, Friday, July 4, 2003.

2 The Los Angeles Times, September 1, 2003.

3 《大紀元時報》2003年9月19日A5版。

4 《大紀元時報》2003年12月12日，A1，A9版；

看禁书就上禁书网：http://www.bannedbook.org/

5 「廣東有關方面在非典時期的惡劣表現！！！」(ZT) 作者：根本英俊，發表時間：2003年4月23日 13:17:49。世紀中國網站・世紀沙龍討論區，http://www.cc.org.cn/。

6 Time，2003年4月8日，《亞洲周刊》(香港) 2003年5月6日至2003年5月11日。

7 《三聯生活周刊》2003年6月9日封面故事。

8 《亞洲周刊》(香港) 2003年5月6日至2003年5月11日。

9 「『非典』時刻的中國官員」，《三聯生活周刊》2003年4月18日封面故事。

10 「『非典』時刻的中國官員」，《三聯生活周刊》2003年4月18日封面故事。

11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SARS) - multi-country outbreak"，March 15, 2003，Disease Outbreak Reported，見世界衛生組織網站 http://www.who.int/.

12 「世界衛生組織：北京薩斯資料不充分」，BBCNEWS，2003年04月29日 格林威治標準時間 01:03 北京時間 09:03 發表。

13 中新網 2003年4月23日電，「北京有『不明疫情』純屬謠言，散佈謠言者被捕」；新華網廣州 2003年4月29日電：「廣東警方拘留13名編造散佈有關非典假消息者」。中新網網址：www.chinanews.com.cn。

14 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名記者汪永晨：「北京抗疫新聞和實情差距太大」，當時這一電子郵件在網站上到處流傳，多維、博訊 2003年5月3日曾登載該消息。

15 James Kynge: "China fires journalists for prostitution story", Financial Times, May 28,2003.

16 http://www.simonsays.com/.

17 《紐約時報》2003年9月24日。同其 BBC、VOA 均做過相同報導。

看禁书就上禁书网：http://www.bannedbook.org/

18 余傑：「被肢解的《希拉蕊回憶錄》」，www.observechina.com.（觀察），2003年8月20日。

19 「希拉蕊回憶錄大陸中文版發行權被收回」，VOA，2003年12月24日。

20 邱新睦：「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研究綜述」，《當代中國研究》（美）2003年第4期。

21 該書由中國人民大學2002年7月出版，關於此書的出版過程見譯者任曉、於真所寫的文章「一本書的誕生——我們漫長而尚未到達終點的跋涉」。

22 「三大亮點凸顯中國的民主」，《人民日報》，2005年10月21日。

23 China Cracks Down On Growing Debate Over Political Reform,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September 24, 2003.

24 "Hu Jintao: China's Gorbachev?" BusinessWeek, http://search.businessweek.com/contents.

看禁书就上禁书网：http://www.bannedbook.org/

看禁书就上禁书网：http://www.bannedbook.org/

第一章

控制新聞是愚民政策的主要手段

看禁书就上禁书网：http://www.bannedbook.org/

極權主義的統治者認為最理想的子民並不是納粹黨與共產主義的人士，而是喪失分辨事實和假象（即所謂「經驗的真相」），分辨真實與虛假（即所謂「思想的準則」）能力的民衆。

——漢娜・阿倫特：《極權主義》
（Hannah Arendt: *Totalitarianism*）

思想罪不是該當死罪，思想罪必須處死。
(Thoughtcrime does not entail death, thought-crime IS death.)

——喬治・奧威爾：1984
（George Orwell: *1984*）

看禁书就上禁书网：http://www.bannedbook.org/

聰明且有知識的人民善於思考，明辨是非，使國家易於管理；愚蠢無知的人民容易盲從，便於統治。現代民主國家致力於提高國家的教育水準，改善國民的知識教養，是因為民主制度需要人民的參與，並在民眾參與的基礎上形成政治制衡。

所有的專制極權國家都毫無例外地選擇愚民政策，因為無知的人民容易被專制者玩弄於股掌之上。中國共產黨政府的愚民政策包含兩個重要內容，一是通過教育對民眾灌輸中共的意識形態，包括經過美化的中共歷史與「愛黨」、「愛領袖」教育；二是控制媒體，美化現實與政府，掩蓋社會陰暗面。用中國政府的行話來說，叫做「多做正面報導，少做或者不做負面報導」(即只報導好消息，不報導壞消息)。在專制政治下，操縱輿論就能操縱人的思維和行動。

中共政府的愚民政策有兩個來源，一是來自中國古代的統治思想；二是師從蘇聯史達林時代控制思想言論的方法。

中國古代的皇帝設地方官時通常用「牧」這個名詞，按照中國漢字的意義，「牧」是畜養之意，即飼養牛、羊、馬、豬等動物。也就是說，中國統治者視民眾如家畜，視統治國家如同放牧家畜。中國儒家的「亞聖」孟子也說過：「民可虛其心，果其腹」，意思是應該讓民眾頭腦空空，不善思索，但要讓他們吃飽。對這一點，中國政府心領神會，儘管讓人民吃飽這一條一直做得不好，但讓老百姓成為不會思索的群盲卻非常成功。

而前蘇聯從列寧到史達林，一直都將媒體當作宣傳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機器。蘇共的這點統治經驗，儘管被民主世界視為邪惡之至的「洗腦」，卻被中國政府全盤照搬，且「青出於藍，且勝於藍」。簡言之，在80年代以前，中國的新聞媒體控制主要依靠意識

看禁书就上禁书网：http://www.bannedbook.org/

形態控制；從90年代開始則主要依賴更精巧的技術控制，其手法比當年的蘇共做得更隱蔽、更巧妙，也更成功且不容易被國際社會察覺。

一、1978年以前中國新聞控制的演變與特點

1. 中國政府為什麼要控制新聞？

控制新聞的目的當然是為了操縱輿論，影響公眾思維。早在中國共產黨作為在野黨與國民黨政權對峙時，中共高層就已經知道影響輿論的重要性，其操縱手法極其高明。

中共建政後的新聞業模式完全照搬前蘇聯的《真理報》模式，甚至連報社內部的整個建制，如部門設置等都一一照搬不誤。這個模式有幾個特徵：第一，無視社會實際狀況，只根據政府的文件指示辦報。至於新聞報導是否符合事實，根本不在考慮之列。據一些老報人回憶，他們當時寫的一些通訊，就是根據上級意圖找材料和「典型」，選擇其中有用的部分加工寫成所謂「新聞」；第二，傳媒只對政府負責，從不尊重讀者的看法和評價；第三，專登講假話、空話的官樣文章，用固定的體裁寫報導；第四，這種如同宣傳品的報紙，主要不依靠市場發行，而是讓所有的政府機構、事業單位與企業用公款訂報。

既然傳媒只是「黨的喉舌」，中共自然也就從不考慮傳媒的新聞屬性。但因為要在國際社會表明自己也屬於現代文明國家，中國共產黨對新聞自由另有一套說辭。這種說一套做一套的兩面派傳統由來已久，早在20世紀40年代與國民黨政權爭奪天下時就有清晰

看禁书就上禁书网：http://www.bannedbook.org/

痕跡可尋。當時以周恩來為首的一些中共理論家與高級文化幹部，一方面在中共統治的區域為發動殘酷的思想整肅運動清洗異己，並從肉體上消滅他們，另一方面又以新聞自由與言論自由的捍衛者身分，在國民黨統治區發表過不少有關新聞自由與言論自由的文章，藉以攻擊國民黨政府，爭取民眾對共產黨的支援[1]。有趣的是，1999年一位中國知識份子將這些中共歷史文獻編成一本書出版，這本名為《歷史的先聲》的書卻被中宣部與國家新聞署查禁，理由竟是「不能讓少數人借用我黨的歷史文獻來攻擊社會主義制度」。而北京大學一些學生看過這本書以後告訴筆者，他們簡直不敢相信一向對言論思想新聞實行嚴厲管制的中國共產黨，在五十多年前竟會這麼「推崇」言論自由[2]！

中共的所作所為表明，以爭取新聞自由與言論自由為口號，反對政治敵人國民黨，只不過是他們奪取政權的藉口而已，事實上他們從來就沒有打算實行所謂「新聞自由」。在毛澤東看來，所有的報導都要體現中國共產黨的英明偉大與至高無上的領導地位，倘若新聞媒體批評政治與社會陰暗面，就是「無政府狀態」。一件很小的事情足以說明毛澤東與中國共產黨的這種霸道心態：1951年，曾積極幫助中共奪取了政權的「中國民主同盟」以為毛澤東會實踐當年的許諾，讓其參與國家管理。該同盟在中共的許諾與支援下辦了一張表面上由民主黨派主管的《光明日報》，總編輯以為有了自己的言論陣地，非常高興，但隨之發生的一件事情狠狠地教訓了他們。當時中共中央針對一件國際事件發表了聲明，並由新華社為各民主黨派中央委員會代寫了一份聯合聲明，表示支援共產黨的立場。《光明日報》認為自己是民主黨派的報紙，於是將民主黨派的聲明放在了頭版頭條的位置，將中共中央的聲明放在了頭版二條，

看禁书就上禁书网：http://www.bannedbook.org/

結果引起中共高層震怒，認為這樣排版是一場「政治事故」，中共中央宣傳部命令追回這一天的《光明日報》，全部銷毀，立即重新排印；並指示《光明日報》必須像《人民日報》那樣，將中共的聲明列在頭版，民主黨派的聲明列於其後。時任《光明日報》主編的儲安平因為想堅持新聞人的獨立原則，不久後就被迫辭職，從此以後備受冷落，並在毛澤東策劃的「反右派運動」中，成為全國著名的「右派」，身罹奇禍，最後落得個家破人亡的悲慘結局[3]。

客觀地說，任何統治者都不會喜歡接受社會監督。正如本書前言中所說，美國第26任總統西奧多・羅斯福就曾用「扒糞者」來表達自己對勇於揭露醜惡的記者們的厭惡感。但美國的社會制度卻保證了這些「扒糞者」能夠生存並受到廣泛的社會尊敬。而在中國的專制極權政治體制下，從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直至當前的胡錦濤政府，口頭上從來都承認新聞輿論的監督作用，但在施政中卻堅決拒絕新聞媒體履行社會批評與社會監督的責任，並不斷地以控制新聞媒體為政府的主要任務。

控制新聞輿論的首要目的當然是為了穩固統治。共產黨政治從來就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暴力原則，這種暴力原則被毛澤東概括為「槍桿子裡面出政權」與「無產階級專政下的階級鬥爭學說」；二是通過宣傳與教育控制人們的思想，讓統治下的民眾相信共產黨政權的統治是最好的統治，所做的一切包括任何暴行都是正當的，凡對共產黨政權持批評態度者就屬於「反動落後分子」，用暴力消滅他們是必要的。中國所有的媒體都灌輸同一種政治觀念，讓人們沒有任何可選擇的資訊，習慣於同一思維。

透過政治暴力與意識形態教育宣傳這兩種方式，中國共產黨統治中國大半個世紀後，終於使許多中國人自發地排斥世界上的普世

看禁书就上禁书网：http://www.bannedbook.org/

2. 毛澤東時代控制思想的特點

要瞭解中國政府目前對媒體的控制，還必須對1978年前的控制方式與特點略作說明。

1949年，中共建立政權以後，將中華民國在大陸時期（1911～1949年）所有的報紙雜誌廣播電臺全部接收，並把這些媒體「改造」為中共控制下的「以《人民日報》為龍頭」的「社會主義新聞事業體系」。官方通訊社新華社是以中共1931年在江西瑞金成立的紅色中華通訊社為基礎發展起來的，官方報紙《人民日報》的前身則是中共華北局機關報。經過這種「改造」，中華民國時期曾興盛過的民間媒體從此消失，除了中國共產黨黨報之外，只剩下形式上由所謂「民主黨派」主辦但歸中共領導的《文匯報》、《大公報》與《光明日報》，這些「民主黨派」報紙必須按黨的節拍起舞，偌大的中國只剩下一種聲音，即中國共產黨的聲音。

這裡不得不提到一些歷史冤案，那就是中共建政之初對記者的屠殺。筆者在芝加哥大學的圖書館裡曾發現一本發黃的小冊子，書名叫做《中共屠殺記者》，裡面詳細記載了1951年中共政府在廣州屠殺記者的暴行。當時中共政府抓捕記者後，先是誘之以「坦白從寬」，強迫他們寫「坦白書」與「悔過書」，再逼迫他們寫「告港澳同業公開信」，「敦促」港澳新聞業向共產黨「投降」，繼而又在廣州槍斃了《星島日報》與《大公報》的六位記者趙非、羅金泉、陳廣平、鄭孝平、葉雲笙、駱樹藩，同時還抓捕了數十位新聞記者，其中不少以後就永遠不明不白地失蹤了。與此同時，上海槍斃了記者黃誠，廣西梧州槍斃了記者李覺非。而根據記載，這些被殺的記者完全是無辜的，其中好幾位一直支援與幫助共產黨，曾被共產黨

看禁书就上禁书网：http://www.bannedbook.org/

價值，如人權，自由，民主、崇尚生命等觀念，認為那都是資產階級的文化價值觀念，並不適應中國國情。這種影響之深遠，從下列事實可證：許多中國大學生尤其是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以後成長的年輕一代，即使僥倖出國留學，他們對西方社會有關中國的歷史著作，如涉及韓戰，中美關係，60年代初「三年大饑荒」時期中國餓死3,000萬人的史實，以及「文化大革命」等，大多數抱著不相信的敵視態度，認為那是西方國家的「反華勢力」對中國的誣衊。許多留學生歸國後，竟然成為宣揚「中國人素質太落後，不宜實行民主」這個官方觀點的活躍分子。這一點既讓美國大學的一些教授吃驚，也令這些教授萬分不解。

在長達50多年的專制統治中，由於在意識形態教育與宣傳方面的巨大成功，中共政府經歷過種種由自己一手製造的危機，仍然能維持統治，並且透過宣傳讓中國多數民眾相信：民主將會造成動亂；沒有共產黨的統治，中國就會陷入動蕩與混亂。

中共控制新聞的第二個目的則是為了在國際社會塑造一個良好的「中國」形象，以提高國際地位。在改革開放以前，按毛澤東的定義，中國的新聞媒體是與「帝（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民主國家）修（前蘇聯）反（臺灣、香港等一切國際反華勢力）進行鬥爭的武器」；在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的媒體則被中共當作引導世界認識中國的工具。中國的真相是什麼，從來就不是中國的新聞媒體報導關心的事。中國政府需要向國際社會展示其「美好」的一面，以吸引大量外國投資，這才是媒體報導的主要任務。至於那「美好」的一面是否真實並不重要，只要能讓外國讀者相信就行。但從目前國際社會中聲調甚高的「中國繁榮論」來看，中國政府控制媒體的第二個目的已經有了一份不壞的「成績單」。

看禁书就上禁书网：http://www.bannedbook.org/

稱為「進步記者」，視為「朋友」與「同路人」[4]。由於當時中國處於消息封鎖狀態，完全有理由相信，在那「殺人如草不聞聲」的毛時代，這本小書上面記載的只是作者當時能夠蒐集到殺人布告上所載的部分人而已，還有更多因言獲罪的記者就這樣消失於歷史的塵埃之中，連名字都沒有留下來。

1949年以後，中國大陸的《文匯報》與《大公報》雖然形式上是民主黨派的報紙，但卻沒有任何發表言論的自由。理解中共新聞控制的關鍵並不在於報紙由誰開辦，主要是看中共控制管理新聞媒體的政策與方式。1978年改革以前中共的新聞媒體管制效仿前蘇聯。那時中國社會處在毛澤東的鐵腕統治下，沒有任何思想自由。中國人形容當時的情況是「10億人一個大腦」，即毛澤東的大腦。「聽毛主席的話，按毛主席的指示辦事」，不超過當局允許的範圍發表言論是每個中國人都必須恪守的行為規範。而毛澤東控制社會的方式是「發動群眾」，在群眾中培養「積極分子」，讓「積極分子」自覺監視周圍人群，並鼓勵人們以各種形式告密，名之曰「檢舉揭發」，告密者會得到等級不同的各種獎勵。以任何形式（如日記）記錄下來的不同於官方版本的個人思想，只要被人偷窺到，都會給一個人及其家庭帶來滅頂之災——那時候的中國根本沒有個人通信自由這一說，任何單位的負責人與同事都可以拆看他人信件，在政治上受到歧視的所謂「地富反壞右」等人的信件，更是人人都可以檢查。

江西姑娘李九蓮在給男友的信件中表示了自己對時局的看法並有所批評，被這位卑劣的男友告發後，當局以「反革命」罪名逮捕了她。李九蓮在牢獄中受到種種極為殘酷的折磨。為了不讓這位烈性的姑娘說話，獄警用一根尖銳的竹籤將她的下顎和舌頭刺穿成一

看禁书就上禁书网：http://www.bannedbook.org/

體。在受盡數年殘酷的牢獄折磨後，李九蓮最後被當局殺害，死後無人敢掩埋屍體，被壞人將乳房陰部割去。小學教師鍾海源也是一位20餘歲的年輕女子，她並不認識李九蓮，只是因為出於正義感同情李的遭遇，並為之奔走呼籲，最後也被判死刑，處決時更是被活殺取腎（一位高幹子弟患腎病需要活體移植）——讀者千萬不要以為這又是「文化大革命」的罪惡，因為兩位姑娘雖然是在「文革」期間入獄，但被殺害時卻已經是打倒「四人幫」，結束毛時代以後的1977年與1978年。這一冤案當中，除了這兩位主角之外，還有40多人因為李九蓮打抱不平被判刑，600多人受刑事，行政，黨紀處分。與李九蓮事件相同的還有遼寧張志新冤案（為怕張志新呼喊口號，死前張被割斷喉管，指示割喉管的是毛澤東的侄子毛遠新），吉林省長春市史雲峰冤案（行刑前將其嘴唇兩角用線縫起來）[5]。

中共政府對私人信件中談論國事所表現的批評意見都如此不能容忍，不惜大興冤獄，殺人禁聲，自然更不允許人們在報紙雜誌上公開發表批評意見。對報紙的管理，毛澤東的方式極其簡單明瞭，即「報喜不報憂」：「假如辦十件事，九件是壞的，都登在報上，一定滅亡。」[6] 按此精神，中國的報紙其實只需要一個聲音，即毛澤東的聲音，以中共中央名義發布的聲音，其實只不過是對毛澤東意圖的解讀而已。

要言之，毛時代不斷發動的各種政治運動，以及用於懲治思想罪與言論的「反革命罪」，被濫用到非常荒謬的程度，不僅各種因懷疑官方思想的而成立的「學習小組」成員被以「反革命罪」處以重刑（經常是死刑與無期徒刑），即使是稚齡小孩呼喊一句「打倒毛主席」的口號，也會將其家長抓起來處以重刑，理由是「小孩不

看禁书就上禁书网：http://www.bannedbook.org/

懂事，背後一定有家長教唆」。1976年冬天，毛澤東死後不到兩個月，筆者在家鄉曾親眼見到法警將一名不到30歲的年輕女子綁赴刑場槍決，其罪名只是因為她那不到3歲的幼兒曾揮著小拳頭對毛澤東與新的中共黨主席華國鋒的畫像喊了幾聲「打」，被鄰居檢舉告發。當局認定孩子的「仇恨」源於這位年輕母親的「教唆」，將其判處死刑。當這位女子臨刑前被五花大綁立於刑車之上遊街示眾時，她的媽媽與妹妹抱著那位小孩，追著刑車淒厲的哭喊聲至今還在我耳邊回盪。

這一時期中共政府的思想控制極其嚴厲，再輔之愚民教育，中國與西方民主自由的文化價值觀幾乎處於完全隔絕狀態，絕大多數中國人甚至連懷疑中共專制統治的能力都沒有，因為他們不知道世界上還有另一種更有價值的生活存在；加之中共用極其嚴酷的方式鎮壓，除了被鎮壓者本人受盡種種折磨而死，其家屬子女也被打入社會底層，遭受嚴重的政治歧視，不能入學、就業，甚至不能與政治地位高的階層通婚（當時中國實行「階級成份」制度，將人按政治劃分成階級）。在這種紅色恐怖統治下，絕大多數中國人不敢越雷池一步，對於任何「異端」思想都處於自覺防範狀態，那時經常有人因檢舉鄰居、同學與熟人收聽臺灣與美國之音等「敵臺」而獲表彰，筆者當年從城市下放至農村當「知青」時，也因讀外國小說與中國古典詩詞被知青同伴檢舉而受批鬥。沒有任何人認為這種「告密文化」可恥，此風沿襲至今，成了中國人的一大劣根性。

在這種極其嚴酷的控制下，中國政府控制新聞媒體的方式反而極其簡單，因為沒有任何報紙的編輯與記者想在報紙上發表與「毛主席、黨中央聲音」不同的意見，也沒有任何人能夠發表任何批評報導。甚至「領會」上級精神晚了一點，或者一句玩笑話，都有可

看禁书就上禁书网：http://www.bannedbook.org/

能成為中共專政對象。1957年「新湖南報社」的右派集團就是一個典型，當時全報社的143位記者編輯當中，有54人被打成「右派」，其中包括報社社長、副總編與好幾位部門主任。這一冤案中有10多人就是因為一位同事在信中用流行的政治語言開了一些玩笑，而被株連入獄。這些人均被政府送去勞改或者勞動教養，經受了種種非人折磨，有的死於勞改營之中[7]。

到「文化大革命」時期，因「思想罪」迫害人的慘劇更是越演越烈。毛澤東將在1949年至1966年之間發表的作品統統貶稱為「17年資產階級與修正主義文藝路線的產物」，即使作者在作品當中對黨與毛澤東持歌頌態度，還是常常被指斥為「別有用心」、「借古諷今」、「指桑為槐」，因而受到嚴厲批判。在毛澤東當政時期先後兩度擔任過中共中央宣傳部長的陸定一，因其在「文化大革命」中備受折磨，曾在晚年反省說：「我當了十多年的中宣部部長，只幹了一件事：整人。整完了這一批，再整另一批。」[8]在中共官方的宣傳裡，「言論自由」、「出版自由」與「新聞自由」一直被貶稱為「資產階級的腐朽文化價值觀」，這種影響至今猶存，只是不再在官方媒體上公開出現而已，但每逢整肅思想異端時，這套老調還是免不了重彈，尤其是官方會議傳達中央精神時，這套說詞總要出現。

中國媒體專門報導本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偉大領袖」與黨的英明，並以大量篇幅報導資本主義國家，尤其是美國的種種社會弊端，如美國的能源危機、勞動人民晚年生活沒有保障、經濟衰退、物價猛漲，工人收入下降，經常罷工等等，使得中國人民堅信：除中國之外的世界各國人民，都生活於水深火熱的痛苦之中，正在等待中國人民去「解放」他們。這種典型的宣傳機器特點

看禁书就上禁书网：http://www.bannedbook.org/

被當時初到美國的西方國家外交官注意到。1972年中美恢復邦交後，美國首任駐華聯絡處主任戴維・布魯斯（1973年5月至1974年9月）曾在他的日記裡詳細地記下了自己的觀察[9]，這一觀察作為歷史研究資料至為寶貴。作為一個外國人，布魯斯先生當然不會明白要達到這種控制，社會需要付出什麼樣的沈痛代價。

這種血淋淋的嚴酷控制直到1978年以後才算結束，此後由於中國政治經濟環境改變，政府控制新聞媒體的方式也發生了一些變化。

二、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媒體管制

這一時期應該以1989年為界，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1978年至1989年，新聞管制相對寬鬆時期。

1978年以後，中國社會政治環境有很大的變化。在華國鋒統治的最初兩年，鄧小平為了奪取黨內最高權力，並為自己的統治正名，必須否定毛澤東的部分錯誤與「文化大革命」(因為這與鄧本人的政治命運有關)。這時候鄧對所謂「黨內民主論」(即允許黨內存在不同意見與批評聲音）完全認同，並用這種理論作為與華國鋒的「兩個凡是」(即「凡是毛主席說的都是對的，凡是毛主席的指示堅決照辦」）鬥爭的理論工具。這種否定等於打開了「潘朵拉盒子」，改變了中國的政治環境，也決定了中國政府控制新聞的方式必須有所改變。要言之，促成這一變化的有下列特殊社會條件：

1.中國已經實行了對外開放政策。這種完全出於經濟考慮的「對外開放」，主要以歐美發達國家為交往對象。這種對外開放帶來

看禁书就上禁书网：http://www.bannedbook.org/

了兩個後果，首先，中國政府因其文化專制及人權狀況落後而受到國際社會尤其是美國的強烈指責批評，開始考慮到改善所謂「國際形象」。其次，人們透過對外交流所看到世界的真相，各種資訊都告訴中國人（尤其是城市裡的中國人），中國是個不發達的專制國家，真正應該被「解放」的不是「世界人民」，而是以「解放者」自居的中國人。

2.由於「文化大革命」確實使中共黨內不少官員利益受損，受到沉重的打擊，他們對毛式專制有所反省，成為中共黨內的「開明派」。胡耀邦與趙紫陽兩任總書記的相對開明，也為輿論開放提供了社會條件，尤其是趙紫陽提出「在經濟學領域內不反自由化」（即不開展思想整肅），中國在80年代出現了所謂「思想解放運動」。

3.這一時期的政治思想爭論，其實主要是中共黨內「開明派」與「保守派」的爭論，爭論的焦點就是要實現所謂「黨內民主」以形成「集體領導」。由於鄧小平事實上不可能擁有毛澤東當年那種說一不二的權威，與他具有同等資歷的元老陳雲、薄一波等人雖然不能形成與他分庭抗禮的格局，但卻可以對他的施政進行某種程度的批評。當時參加爭論的報刊雜誌及人士背後，各有一些中共黨內元老撐腰，不怕打擊，因而能夠在某種程度上批評時政，形成了80年代中國媒體的「開放」氣象。但這種討論只限於黨內「自己人」，對這些黨內不同的思潮，鄧小平仍然沿用毛時代的鬥爭方式，「發動思想鬥爭」，如1983年的「清除資產階級精神污染」與1986年的「反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是意圖清除思想異端的鬥爭。

對黨外的民主要求，鄧小平的態度迥然不同，如對待魏京生要

看禁书就上禁书网：http://www.bannedbook.org/

張貼大字報的地方，後來成了中國政治史上的一個政治符號），鄧小平則用強硬手段鎮壓。由於鄧小平在執政初期，為了爭取民心，已經取消了毛澤東時代臭名昭著的「反革命罪」，鄧小平於是為這種強硬鎮壓找到一個新的罪名，即「洩漏國家機密罪」與「危害國家安全罪」，這種罪名很容易讓浸染在愛國主義教育中的中國人與受懲罰者保持距離。

新聞控制在這段時期內一直存在，只是由於下列諸種因素，使得這一時期的控制相對要寬鬆。這些因素包括：第一，中國當時大眾媒體還未興起，媒體數量相對少，便於政府管理控制；第二，在新的政治經濟形勢下，政府對媒體控制方式的改變還處於「學習階段」，經驗不夠老到，這一特點從頒布的法律法規內容以及動輒下達文件整肅「思想異端」中可以看出；第三，這一時期一般只進行思想整肅，並不開除公職砸飯碗，「卡住異議者的胃」這一做法還不普遍；第四，國家安全部（類似於蘇聯的KGB）還未大規模滲透社會生活，尤其是還沒有公開承擔思想監控任務；第五，由於政治控制相對寬鬆，知識份子的政治熱情還未衰退，對於因思想問題受整肅者普遍抱持同情態度；第六，由於黨內開明派與保守派各有自己的勢力作後臺，而且沒有任何一種勢力居壓倒性優勢，黨內鬥爭已經沒有「文革」時期那種「鬥垮鬥臭」的殘酷性與血腥性。上述諸因素的存在，使得這一時期的思想鬥爭出現了一個鄧小平等執政者不願意看到的結果：受批判者「越批越香」。

這一時期出現了一些引人矚目的報刊雜誌，如《世界經濟導報》、《新觀察》雜誌、《文彙月刊》、《書林》、《學習與探索》，這些雜誌的領導者屬於中共黨內開明派人士，故經常登載一些思想開放、觀點新穎的好文章，成了這一段時期中國人喜愛閱讀的媒

看禁书就上禁书网：http://www.bannedbook.org/

體。這段時期也是中共統治史上最健康的時期，中國人剛從「文化大革命」的噩夢中醒來，對鄧小平領導的經濟改革充滿熱情與嚮往，民眾的興趣還未從政治轉移到商業及世俗化的時尚方面，政治腐敗也還只是剛剛冒出苗頭。用「充滿希望」來形容當時的中國比較恰當。至今中國傳媒業人士回憶起那段時光，都認為80年代是中共統治下媒體少有的「黃金時期」。

◎第二階段：1989年「六四事件」之後至今

1989年的「六四事件」是個世界性的歷史事件，它產生的「多米諾骨牌效應」使共產主義陣營土崩瓦解，結束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陣營之間的「冷戰」，東歐國家紛紛走出社會主義的巨大陰影。

但這次事件在中國造成的卻是另一番景象：「六四事件」發生以後，中國共產黨最後一塊遮羞布「人民政權」、「人民軍隊」都被撕得粉碎，以鄧小平為首的中共領導層對此進行了反思，一致認定這次事件是「西方資產階級」價值觀侵蝕的結果，於是採取了新的意識形態戰略，一是在教育系統恢復已近於半廢棄的政治思想教育，二是對新聞媒體採取了新的管理方式。

在管理控制媒體的方式上，中國政府的「學習」進展確實非常神速，而且較之毛時代的硬性措施更狡猾、更隱蔽。這一時期的管理具有下列特點：

1.將對新聞媒體的控制管理用法律、法規及法規性政府文件的形式「制度化」。80年代的一些相關條文仍然沿用，同時又制定了不少新的法律、法規，不斷頒發各種文件，強化控制管理。

2.實行政府領導的新聞出版署（局）與中共黨委宣傳部門「雙

看禁书就上禁书网：http://www.bannedbook.org/

軌制」領導，在二者的許可權上，黨領導的宣傳部門大於政府的新聞出版部門。

3.確立了一條「政治問題非政治化處理」的原則。所有「政治思想罪犯」與「良心罪犯」，不再以政治罪名治罪，如果能羅織貪汙腐敗罪名，全用這些罪名懲治；實在找不到這些罪證的，則用「危害國家安全罪」、「洩漏國家機密罪」及「陰謀顛覆政府罪」等罪名懲治，而且發布懲治通告時，不再像「六四」以前那樣，公開下達文件，而是透過電話通知、內部會議等形式。這些會議公布的內容不許記錄、不許錄音、不許外傳。其目的很清楚，「防止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獵名」（獵取名譽）。

4.在新聞報導上，不再像以往一樣，不喜歡某一事件，就對該事件表示沈默，而是採用「攪渾水」的方式，向公眾公開發布一些「混合著部分事實真相的謊言」。這種混雜著部分真相的宣傳，確實比完全的謊話更能迷惑人。堅持講真話的少部分中國學者，與許多國外學者之間對中國問題的看法分歧越來越大，原因就在於外國學者無法辨識這些夾雜部分真相的謊言中，何者為真，何者為假。而這些稱讚中國現狀的外國學者們的主要根據有幾點，一是中國國家統計局公布的資料，二是他們到過中國一些大城市，三是他們曾在中國做過一些調查。但他們忽視了一點，中國國家統計局公布的資料本身經過嚴格的過濾與造假，他們到過的地方也是政府規定的地方，有法律規定哪些城市對外國人開放，哪些城市不能讓外國人去[10]，他們的調查也是在國安局秘密特工參與下完成的，資料拿出國之前必須報中國政府部門審核（這一點是許多外國學者無論如何不願意承認的，因為這關係到他們研究的學術價值）[11]……概言之，他們看到的「中國」是中國政府需要向外界展示的「中國」，他們

看禁书就上禁书网：http://www.bannedbook.org/

聽到的資訊是中國政府希望世界聽到的聲音，外界人士想不到的是，就連加入WTO這種並不十分政治化的事件，中國政府還會由中宣部與中央辦公廳聯合下達「絕密文件」，在長達48條的規定中，明確指明哪些問題不能這樣談，只能按照某種「口徑」談，如果違反了中央規定，要承擔什麼樣的法律後果。這種「資訊不完全」導致了人們對中國的認識片面化，當陷入「資訊不完全」帶來的困惑時，人們可能會以「中國太龐大，太神秘，太特殊」來解釋，卻很少想到這完全是中共政府採用政治高壓手段控制媒體的後果。目前，大量外資源源進入中國，可以說是中國新聞媒體宣傳的主要成就。

5.在嚴厲控制對政治問題發表意見的同時，政府開放了社會生活領域。在性、吃喝玩樂、休閒等所有與政治無關的領域，現在的中國比所有西方國家更為開放。透過這種「引導」，中國社會已經高度商業化與庸俗化。少數大城市裡的「新新人類」生活方式，幾乎與國外的「新新人類」完全同步。大多數中國媒體完全跟著時尚走，少數有社會責任感的媒體只能在政治高壓下艱難求生，且面臨隨時被取締之險。這種商業化與庸俗化使中國人對政治的熱情逐漸衰退，對金錢的追逐則漸漸成為人們生活的主要目標。

6.國家安全局特務系統公開監管互聯網（網際網路），並隨時逮捕一些國安部門認為散布了「危害國家安全」言論的人。在互聯網引入中國之前，中國控制新聞還主要局限於平面媒體（紙質媒體），這種控制對人權的傷害還不易為外界所感知。但互聯網進入中國之後，中共政府對媒體與輿論的控制就不得不從「黑箱操作」進入半公開化狀態。自從中國政府開始建立世界上最龐大的「防火牆」（firewall）開始，直到現在正在花費大量金錢建立的、目的在

看禁书就上禁书网：http://www.bannedbook.org/

於全面監控公民行動的「金盾工程」，這些消息雖然讓世界吃驚，但遠未引起國際社會的廣泛注意。至少人們還沒有想到：中國政府如此在意控制傳媒，是因為真實的中國有太多需要掩蓋的黑暗面，中國政府所展示的「中國」只是幾個「現代化櫥窗」，只是不到15%的總人口的生活狀況，與全面真實的中國社會相差太遠。

因為中國實行嚴格的新聞管制，人們只能聽到一種聲音，這就使國際社會對中國的認知被中國當局主導而不自知。中國政府在媒體上營造的「中國」，與生活於農村地區及中小城市的中國人感知到的中國差距相當大，而國際社會瞭解到的中國，其實就是中國政府在媒體上刻意營造的「中國」。不少學者、商人，以及其他想瞭解中國的人士，都被中國政府公布的統計資料與它發布的社會狀況，被它每年都無數次誇耀的「一枝獨秀的經濟增長」與「GDP神話」所激動。

三、2003年的「新聞媒體改革」神話

2003年是國際社會對中國充滿期待的一年，人們對胡錦濤「七一講話」翹首以待，以為那裡面會有不少關於政治體制改革的宣言，但胡卻給他們當頭一盆涼水。而部分親中共人士與學者仍然癡心不改，頭上的涼水還未抹去，又開始製造一個新的神話：「中國媒體改革終於啟程」[12]。持此論者的全部依據是2003年6月20日中央電視臺在「晚間新聞」節目中播送了一條簡短通知。雖然這條消息第二天登上了各大官方報紙的頭版位置，但它也仍然只是短短的一句話：中共中央宣傳部、新聞出版總署和國家郵政總局聯合發出通知，禁止報紙期刊在9月份以前徵訂2004年的報紙和期

看禁书就上禁书网：http://www.bannedbook.org/

刊，只有科技類出版物不在此列。

這條新聞引起了軒然大波，儘管中國政府已明白聲稱，此舉目的是「制止為保證發行量而推行的各種強制性攤派徵訂手段」，但由於中國已經陷入無法擺脫的「改革疲軟症」，對中國持樂觀態度的觀察家們不時需要製造一些「改革神話」安慰世人，於是「中國新聞媒體改革已經啟航」的報導就成了海內外媒體（包括一些很有聲望的媒體）報導的主題，彷彿中國的新聞改革馬上就要開始，而這將成為所謂「胡溫新政」的主要內容與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先聲。一時之間，國際社會對中國新一屆政府的期望值大大升高，讚美之聲四起，儘管那時香港人民正在為反對「二十三條」苦苦鬥爭。這一「神話」的製造者們甚至沒有仔細思考一下這當中存在的邏輯矛盾：從19世紀中期開始，香港就已經享有言論自由與出版自由，直到「九七回歸」以後才不得不開始「自律」（自我檢查），並日漸失去新聞自由，但中國政府意猶未盡，還要制定「二十三條」迫使香港人徹底噤聲。在一向有言論自由的香港都要取消新聞自由，在中國大陸，中國政府為什麼又要恩賜給中國人新聞自由？

這種樂觀一直到延續到8月初，此時全稱為「關於落實中辦、國辦《關於進一步治理黨政部門報刊散濫和利用職權發行，減輕基層和農民負擔的通知》的實施細則」（以下簡稱為「實施細則」）終於公開發布，整個「實施細則」的內容完全沒有任何「改革」蹤跡可尋——除了任何改動哪怕倒退也可以被稱之為「改革」。

1. 決定媒體生死的標準是「政治導向正確」

在真正的市場經濟國家裡，傳媒是具有獨立法人地位的企業。誰是某家媒體的投資者，誰就是某家媒體的老闆，決定媒體生存與

看禁书就上禁书网：http://www.bannedbook.org/

死亡的是市場，沒有讀者的報紙注定死亡。但這一國際規則對中國的傳媒業並不適用，中國決定媒體生與死的至今還是政府，

在「實施細則」中，中國政府為報刊的「生」與「死」定下了幾條標準，可以繼續生存下去的是以下幾類：

第一類，中央的三報一刊（《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經濟日報》、《求是》雜誌），各省的黨報黨刊；第二類，政治導向正確且5年以上沒有違規紀錄、經營狀況良好、讀者自費訂閱量超過80％（這一條僅限於省級報刊雜誌社）的報刊社；第三類，黨報所辦的子報。

政治導向不正確、創辦不夠5年、或者在經營期間5年內有違規紀錄的予以停辦。不屬於黨報系統，但又不在停辦之列的，則統統劃歸到黨報集團，或者由各級黨報兼併，此舉大大強化了黨報黨刊的領導地位。

據中國媒體業內人士估計，經過此次整頓，將有三分之二的媒體消失。媒體數量減少其實有利於中國政府對媒體的管理。一是媒體從業者就業艱難，再也不敢冒險犯禁；二是減少了政府的管理成本。據中國國家新聞出版署公布，截至2003年11月，已有677家媒體停業[13]。

2. 變地方部門分散的攤派為中央黨報黨刊的集中攤派

這次關閉媒體最冠冕堂皇的理由是取消攤派，減輕基層負擔。

媒體依靠行政命令攤派發行，確是中國特色。至2002年底，中國共有各類報紙2,137種，期刊9,029種，但其新聞來源卻相對單一，尤其是在事關全局性的政治經濟問題，外交關係與國際社會的重大事件，幾乎都是按照新華社所發的「通稿」。這種情形下，

看禁书就上禁书网：http://www.bannedbook.org/

不少報紙都需要依靠其主管政府部門利用權力「攤派」才能找到「訂閱者」。即使是《人民日報》、《求是》雜誌、《半月談》這類中央級報刊雜誌，每年都要由中宣部與各省（自治區）層層下達徵訂任務攤派。據統計，在中國2001年發行量超過100萬份的雜誌中，黨刊佔有5種，教育輔導類佔有9種。其中黨刊是透過政府系統攤派，教育輔導類主要由學校向學生攤派，學生們每天功課負擔超重，根本沒有時間閱讀多少課外讀物。如果取消這類攤派，相信中國民眾會非常歡迎。

由於「實施細則」的標題含有「治理黨政部門報刊散濫和利用職權發行」字樣，不讀全文，真有可能會發生誤解。但只要細讀「實施細則」的內容，就會發現此次「媒體改革」雖然以取消攤派為名，但目的卻只是為了消滅各級黨報黨刊的競爭者，「實施細則」的第四部分第一條中就明確規定：「用定額管理的公費訂閱重點黨報黨刊的範圍，是指《人民日報》、《求是》雜誌、省級黨報黨刊、地市級黨報」，凡是公費訂閱者，「要首先訂閱黨報黨刊特別是中央級黨報黨刊」。這一規定可謂一箭雙鵰，一是將宣傳陣地繼續牢牢掌控在黨報黨刊手中；二是讓任何非黨報黨刊的報刊雜誌減少了公款訂閱戶。前兩年曾有調查資料，除了少數幾家報刊雜誌擁有大量私人用戶之外，大多數中國人還是依靠公款訂報滿足閱報這種「文化消費」。這條規定可以幫助黨報黨刊擁有龐大的「市場份額」。

3. 新聞檢查將繼續強化

「實施細則」規定，中國的媒體將保持「中央——省——地市黨報（包括報業集團）網路」，並且還將保持原來的「行政級別」

看禁书就上禁书网：http://www.bannedbook.org/

（第三章將專門介紹中國媒體獨一無二的特點「行政級別」）。這樣一來，黨報黨刊將壟斷中國媒體業。

部分論者曾對這次「新聞媒體改革」寄以厚望，以為從此以後媒體與主管單位脫鈎，再也沒有「家長」嚴加管束。但「實施細則」卻明確規定：「管辦分離指在堅持《出版管理條例》確定的主管主辦制度前提下，對報刊管理方式做出的一種調整」，「找不到新聞出版行政部門認定的具備資格的主管主辦單位的，予以停辦」。「家長」依然存在，找不到「家長」的必須死亡，這一「改革」恐怕讓那些找不到「家長」，即「求做兒女而不得」的媒體痛苦萬分。

其實中國政府自己從未聲明要放棄對新聞的管制。「實施細則」指出：「管辦分離後，主管部門仍要履行主管職責。主要包括對報刊的輿論導向、出版質量進行監管；……加強領導班子建設，任免報刊單位主要負責人」。在國家新聞出版總署的網站上曾登載一篇題為「中國新聞改革，中央只保留四家報刊」的文章，該文在評述了2003年「新聞改革」後總結說：「表面上看，這項改革將加速大陸報業新聞競爭，有利於改善新聞報導的質量；但事實上，中共中宣部卻透過嚴密的新聞審查，來達到管理和控制的目的。據悉，未來成為法人團體代管的各家媒體，政治審查和新聞審查仍會繼續進行，而媒體本身的『自律』亦嚴格要求。[14]」

最能證明新聞體制改革純屬「神話」的，就是中國政府歷年來設立了種種限制輿論的惡法，封堵民怨。從90年代以來，中共已經頻頻動用「危害國家安全罪」、「洩漏國家機密罪」、「陰謀顛覆政府罪」這三條罪名來壓制輿論，再輔之以由宣傳部門實施的處罰，為了生存，媒體已經高度自律。

看禁书就上禁书网：http://www.bannedbook.org/

值得提醒的是，持「中國媒體行將改革」論者有意遮罩了幾條重要資訊，第一，SARS期間關於嚴懲傳播SARS謠言的惡法出爐，並依此惡法抓捕了幾十個人。這條惡法的關鍵在於：凡不同於官方SARS版本的一律被視之為謠言。這種惡法能夠公然行之於中國，是對言論自由與法律尊嚴的最大褻瀆。第二，就在2003年7月，被中國視為「改革開放前沿」的深圳市政府推出「出版導向預警工作辦法」，對該市所轄的報刊、電臺、電視等新聞出版物進行「制度性」的審讀預警處理，對出現「政治導向偏差」的出版物採取「審讀意見」的形式，通知出版單位，凡一年收到兩次「預警通知書」的，將在內部通報批評，收到三次者，要處分主管負責人，甚至撤職。當局計畫通過此舉，「制度化」地監控傳媒業[15]。

可以預期到的是，「實施細則」將結束不少媒體的生命。在強大的政治壓力下，中國媒體會為了生存，不得不暫時有所收斂。中國媒體從業者在90年代媒體市場化這一過程中努力開拓，如對腐敗的有限揭露、環保問題以及其他社會化議題的討論，確實部分消解了媒體作為「黨的喉舌」這一角色的作用，但「實施細則」將使中國媒體市場化的成就重新回到90年代初這一起點。

閱讀中國政府頒佈的各種法律法規確實累人，但恰好這是最重要的資訊。「實施細則」既已頒佈，在新浪網等各大網站上也可下載，如果大多論者能夠認真閱讀，不人云亦云，可能就不會再有「新聞媒體改革」的神話流傳。

看禁书就上禁书网：http://www.bannedbook.org/

---

1 《歷史的先聲——中共半個世紀前對人民的莊嚴承諾》，笑蜀編，香港博思出版社2002年5月初版。

2 王若水，「整風壓倒啟蒙：五四精神與黨文化的碰撞」，《當代中國研究》（美）2001年第四期；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來的》，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王實味等著：《野百合花》，花城出版社（廣州）。

3 章詒和：「回憶儲安平——兩片落葉，偶然風吹在一起」，載於「浴火鳳凰」：http://people.freenet.de/chinatown/index.htm。

4 黃新民，《中共屠殺記者》，香港自由出版社1951年出版。

5 老鬼：《血色黃昏》，（北京）工人出版社1987年出版；戴煌：「為『惡攻英明領袖華主席死難者李九蓮昭雪』」；胡平：「中國的眸子」，《中國女性悲歡錄》，〔廣州〕花城出版社1993年出版。

6 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的講話（1959年7月23日）。

7 朱正，《1957：新湖南報人》。這本書的主編就是當年新湖南報的副總編輯，編後延宕多年，未能出版，最後由撰寫者出資，於2002年4月自費印製了1,000本，分送朋友。筆者的一本是李銳老人委託他的女兒李南央從中國帶來的。

8 轉引自沙葉新，「輿論欺騙術開始破產」，《開放》2003年10月號。

9 Nelson lankford. The last American Aristocrat: The Biography of Ambassador David K. E. Bruce, (Boston: Little Brown, 1996).

10 這一規定內容詳見「國務院、中央軍委批轉公安部、總參謀部、外交部、國家旅遊局《關於外國人在我國旅行管理的規定》的通知」（1982年10月9日）。自1978年開始，由中共中央政府、國務院及各部委頒布實行且至今並未廢止的對外及涉港澳臺地區資訊保密的法規性文件共有60多項，其中包括旅遊、出版、攝影、複印、閱讀圖書資料、發布統計資料、對外經濟合作提供資料保密、對外科

看禁书就上禁书网：http://www.bannedbook.org/

技交流保密、投稿、對外交流、舉辦科技展覽會、複印資料等。見《中華人民保密法全書》，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

11 《中華人民共和國統計法實施細則》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外的組織、個人需要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進行統計調查活動的，應當委託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具有涉外統計調查資格的機構進行。這方面的法規性文件共計有：《涉外社會調查活動管理暫行辦法》（2001年3月15日），《涉外社會調查專案申報須知》（2000年3月20日）。按照上述法規規定，所有涉外調查只能由經由國家統計局民間與涉外調查管理處批准認可的機構負責，名單載於「涉外社會調查許可證頒發公告（一）」（2000年7月28日）「涉外社會調查許可證頒發公告（二）」（2000年8月17日）。

查閱上述資料，可至中國國家統計局主辦的中國統計資訊網，www.stats.gov.cn。

12 「中國媒體改革終於啟程」，新浪網，2003年7月7日09:11，http://www.sina.net。

13 《人民日報》2003年11月28日，第2版。

14 中國新聞研究中心網站，2003年7月10日，www.CDDC.net。

15 《明報》（香港）2003年7月11日。

看禁书就上禁书网：http://www.bannedbook.org/

第二章

政府對新聞媒體的控制



看禁书就上禁书网：http://www.bannedbook.org/

2002年10月，總部設在巴黎的「記者無疆界」組織首次發表了一份全球新聞自由排名表，在總共包括139個國家和地區的排名表上，中國大陸和北韓分別列在138與139位。2003年10月20日，該組織再次宣布：在包括168個國家在內的新聞自由度排名上，北韓位列末位，中國位列倒數第6位。2005年10月，記者無疆界再次公布了全球167個國家新聞自由狀況的排名表，中國的狀況則依舊沒有改善，排在第159位。比中國還要差的只有北韓（倒數第一）等8個國家。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 *Second World Press Freedom Ranking (2003); Forth World Press Freedom Ranking 2005*)[1]

中國目前是世界上言論、出版自由最充分的國家之一，外界關於中國新聞、言論、出版方面的某些議論是毫無根據的。政府依法支援媒體機構履行自己的社會職能，明確規定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無理干涉、干擾媒體的正常採訪、傳播和經營活動。……手機簡訊近年在中國迅速發展，成為新興傳播載體。

——中國新聞出版總署副署長柳斌傑
2003年11月2日在博鰲亞洲論壇的講話[2]

看禁书就上禁书网：http://www.bannedbook.org/

中國是世界上現存的少數幾個實行新聞管制的國家之一，而且具備完整的管制制度。這一制度包含下列內容：第一，由法律與行政法規構成的管理制度；第二，由中共宣傳部門與政府新聞出版署對媒體跟蹤管理，稱之為技術控制；第三，思想控制。

一、法律與憲法相悖

中國政府對待法律的態度如同兒戲，政治權力凌駕於法律之上，人情的作用大於法律，任何一個權力部門與官員在自己所管轄的區域內，都是可以超越法律的「最高權威」。然而這還只是中國特色的「法治」的一個問題，另一個更可笑的現象是中國的許多法律都明顯地違背憲法，突出的例證就是對傳媒的控制與管理。

由於「憲法」要考慮一個國家在國際社會中的「形象」，故需要承認公民享有「言論自由」以裝點門面。中國的憲法規定，「中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第35條）」，「以及進行科學研究、文學藝術創作和其他文化活動的自由」（第42條）。但在社會生活中，憲法權利形同虛設，起實際作用的是旨在限制言論自由的各種法律與不斷頒布的「行政法規」及與種種「政府令」。這些法律之多，在全世界可算獨一無二，而且不管哪一部法律，其內容都是有關如何控制、管理並約束新聞媒體與公民言論自由的各種條文，沒有一部法律賦與媒體任何權利，其內容正好與憲法相違背。

筆者曾經專門查閱各種有關控制媒體的法律，按照中國政府劃分的類別，共有法律、行政法規、規章和規範性文件四大類，至今仍在發生作用的共有60多部（不包括地方立法），在其他法律裡涉

看禁书就上禁书网：http://www.bannedbook.org/

及的則有更多。本書正文只列舉幾部直接相關的法律，這些法律包括：

《出版管理條例》（1997年）；

《報紙管理暫行規定》（1990年）；

《期刊管理暫行規定》（1988年）；

《音像製品管理條例》（1994年）；

《電影管理條例》（1996年）；

《印刷業管理條例》（1997年）；

《廣播電視管理條例》（1997年）；

《關於嚴厲打擊非法出版物的通知》（1987年）；

《外國記者和外國常駐新聞機構管理條例》（1990年）；

《衛星電視廣播地面接收設施管理規定》（1994）；

《互聯網出版管理暫行規定》（2002年）。

上述這些行政法規幾乎涵蓋了所有大眾傳播媒介的管理。從表面上看，上述法規似乎社會管理職能大於政治控制功能，但只要結合共產黨宣傳部門控制傳媒的作為來看，就可以明白這些法規的真正意圖在於控制。而在中國政府嚴格控制下的所謂「媒體」，只是一台巨大的宣傳機器，如同中國政府給它的命名：「黨的喉舌」。

二、中國政府對媒體的跟蹤管理

上述法律被中國政府稱之為「管理硬體」。但傳媒行業每天面對千變萬化的社會局勢，僅僅憑藉這些「規定」、「條例」管理約束，難以達到滴水不漏之效，所以中國政府對傳媒業實行「兩條線交叉」管理：一條線是中國共產黨的各級黨委宣傳部[1]，指導傳媒

看禁书就上禁书网：http://www.bannedbook.org/

對中共政府的政策做「正面宣傳」，並對傳媒進行跟蹤管理與監察；行政管理（如審批等業務管理）則由政府的國家新聞出版署和各省新聞出版局負責。

這裡必須解釋的是，中國與民主國家在政治上很不相同，是個一黨專制國家，黨對政治生活的滲透無孔不入，且能夠左右與制約政府行為。在政治生活中，黨的各級負責人「書記」的權力高於政府的負責人。

這種雙重控制管理主要運用以下幾種手段：1.對傳媒實行批准登記制，要害是任何傳媒都必須有政府機構作為媒體的主管部門；2.將傳媒業納入黨與政府這架龐大的官僚機器的政治等級序列裡，讓傳媒負責人享有與政府官員同等的政治經濟待遇，這意味著中國傳媒的負責人是官員而不是專業傳媒人士，只按共產黨官員的行為準則辦事；3.建立審讀制度；4.由宣傳部門確定某一時期媒體報導的重心，並隨時頒布各種禁載規定。

透過將媒體從業人員的工資、住房福利等與「政治表現」掛鈎的制度設置，輔之以思想控制，這種控制與毛時代的意識形態控制不同，可以名之為「技術控制」。在所謂「改革開放的新形勢」下，中國媒體能夠以更為隱蔽的方式，達到宣傳機器的效果。

1　中國實際上有兩套政治管理系統，一套是從中共中央到鄉鎮一級的黨委，黨委一般有以下幾套機構：組織部、宣傳部、縣及縣以上黨委還有統戰部，紀律檢查委員會。另一套則是政府機構，政府機構中負責管理新聞出版事務的機構中央是新聞出版總署，省以下是新聞出版局。黨委名義上不負責政務，但實際上對政務干涉甚多。中國將這種現象稱為「黨政不分」，在胡耀邦、趙紫陽任總書記時期，曾列為政治改革的專案。現在隨著黨務對政務的控制日益加強，這項政治改革已經不再提了。

看禁书就上禁书网：http://www.bannedbook.org/

1. 媒體登記的政治資格限制

政府管理媒體的手段當中，最重要的手段是對新聞媒體實行「批准登記制」，由新聞出版總署（或省直轄市的新聞出版局）行使審批權。中國的新聞媒體「批准登記制」的獨特之處在於對辦報人資格設置了種種限制。最重要的一條是任何傳媒都要有主管部門和主辦部門。《報紙管理暫行規定》第十條規定：「創辦正式報紙應當具備下列條件：……有確定的、能切實擔負領導責任的主辦單位和主管部門」，而這些「主管單位」必須是屬於黨政系統的「黨委、政府、工會、青年團、婦聯」的組織，非此類組織連申請資格都不具備。

註冊登記、主辦單位與主管單位制度是中國政府控制傳媒的重要環節。1993年6月，國家新聞出版署發布了《關於出版單位的主辦單位和主管單位職責的暫行規定》，明確規定「主管單位、主辦單位與出版單位之間必須是領導與被領導的關係」，並規定主辦單位對下轄新聞出版單位負有以下責任：監督新聞出版單位緊跟中共的路線，審核宣傳報導與出版計畫，批准重要稿件（主要指涉及政治或批評社會陰暗面的報導），對新聞出版中發生的錯誤負領導責任等等。

這套所謂主管、主辦制度將主管主辦單位與媒體的關係變成了老子與兒子的關係，老子是管理者，兒子自然就是被管理者。由於這套所謂主管、主辦制度為民主國家所無，大多數不在新聞媒體工作的中國人也無從知道，因此2005年8月《中國青年報》編輯李大同就該報新的考評方法發表一封公開信時[3]，國外媒體與中國人的網上言論普遍以為「新的考評方法」只是現任中青報領導李而亮

看禁书就上禁书网：http://www.bannedbook.org/

的個人做法。

李大同那封公開信批評的是中國青年報社的內部控制特點：一是報社內部評價工作業績的考核標準是讓政府（其實就是官員群體）滿意，二是報紙與主管（主辦）單位共青團中央的關係。

其實就事實而言，上述幾條均非《中國青年報》面臨的獨特境地。這一事件的獨特之處在於《中國青年報》過去20多年來曾經有過一段追求成為真正媒體的輝煌經歷，只是近幾年隨著中國政府控制媒體日益嚴厲，無法逃脫慘遭閹割之命運，於是先有盧躍剛，繼之有李大同等想做專業媒體人的編輯記者站出來，公開反對這些「喉舌標準」，因為李而亮制訂的「喉舌標準」確實將中國媒體披上的那件「輿論監督功能」外衣剝得乾乾淨淨，因此也將媒體從業者勉力保持的那點自尊撕得粉碎。

在中國，任何一家正規一些的媒體，都有一套用於內部計算工作量的考評標準，這些考評標準毫無例外都有很強的政治色彩，行政級別越低的媒體，考評標準的政治色彩也越重。考評標準的主要用處是約束記者寫出「政治導向正確」的新聞，並計算工作量。這些「政治導向正確」的「好新聞」，固然讓政府（官員）滿意，但未必就讓讀者喜歡。這些年，中國大多數報社開會總是天天講「要提倡政治家辦報」、「要弘揚主旋律」，——這裡的「政治家」，並非西方意義上的「政治家」，指的就是視服從上級精神為「天職」的政治庸人；而「主旋律」，就是「黨的意志與黨的聲音」這一老說法的與時俱進之表述。

至於團中央與中青報之間那種「老子與兒子」的關係，其實只是將政府文件堂而皇之規定的「主管（主辦）關係」用難聽一點的說法表達罷了。這也不是中青報與團中央獨有的關係，中國每家報

看禁书就上禁书网：http://www.bannedbook.org/

紙雜誌都有主管（或者主辦）單位。這種主管與主辦關係先天性地決定了兩點：第一，傳媒確實與主管（或主辦）單位是管與被管的關係，亦即「老子與兒子」的關係。傳媒負責人如果公關有術，這位「老子」對「兒子」的管理就鬆懈一些，「兒子」在取得「老子」信任的情況下，自主權也就大一些。第二，中國是個人治國家，主管部門負責人的水平也就決定了管理的水平。團中央以前主管中青報的負責人可能相對要開明一些，有時能夠幫中青報撐撐腰，所以過去中青報還能批評一下地方政府與官僚的違法違規行為。但這並不意味著中青報就不是團中央這個主管（或者主辦）單位的「兒子」了，只能說「老子」是明白人，「父子關係」和諧一些。但遇到李而亮這種黨文化薰陶出來的思想殭屍，中青報辦報的迴旋餘地就越來越窄，作為「兒子」的行動自由也就越來越小。可以說，中青報的命運與近兩年胡錦濤正式就任總書記後，對自己的「龍潛之地」特別在意有關。李而亮奉命鎮守這塊「寶地」，他努力揣摩上意制訂出如此規章，只能說行動過急失當，管理水平有限，但不能說這是他違背了黨的意志所採取的個人行動。

這種「主管主辦制度」的規定使私人報紙、民間報紙在中國絕無創辦的可能。從中國政府的政治實踐來看，私人辦報一直被視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反革命罪行」，被視為厲禁。《湖南日報》的唐蔭蓀等五人就是因為在私人朋友間曾經提出過「同人（志趣相同的人）辦報」的想法，就被打成右派，判處徒刑，10餘年負屈含冤，有的則死於非命[4]。1978年改革以後，這類「罪行」則改用「陰謀顛覆政府、危害國家安全」的罪名入罪，不少人因此坐牢。2001年3月中旬，北京大學的楊子力、北京廣播學院的張洪海、北京師範大學的徐偉和中國地質大學的靳海科等四位青年學生就是

看禁书就上禁书网：http://www.bannedbook.org/

因為創辦了一個對外不開放的網站，並在上面討論中國政治體制改革與民主化問題而被秘密逮捕，2003年被中國當局以「陰謀顛覆政府，危害國家安全」罪名判處重刑[5]。

由於審批制度過於嚴苛，使得中國的新聞出版刊號成了稀缺資源，為了獲得刊號，申請者常常要賄賂審批官員。中國的刊號分為全國、地方、內部三種，這三種也因級別不同而各有不同的價格。有的人用盡心機拿到刊號後自己並不辦報刊雜誌，而是出租給其他人經辦獲取利益。

2. 審讀、審聽與審看

中宣部與新聞出版署制定了一套相當完整的報刊審查制度，1989年以後日趨完善。從中央、省（自治區）直至擁有媒體的市縣等各級宣傳部門，都成立了專職「審讀（審聽、審看）小組」，按級別負責審查其轄區內的媒體，「審讀小組」負責審查紙質媒體，「審聽小組」負責審查電臺播音，「審看小組」負責審查電視臺的節目。其人員組成如下：由宣傳部指定一位官員專司其事，並聘請曾經管理新聞出版或做過政策研究的退休官員參與其事。

選上述兩類人參與新聞審查，主要是基於以下幾個因素：一是這類人政治上可靠，二是有工作經驗，三是因這類人士退休後比較清閒，非常重視這類工作機會，絕對服從指令。人員多少視該轄區內的媒體數量而定，內部實行具體分工，每人負責審讀若干份報刊雜誌，或電視、電臺的幾個節目，並負責撰寫審查報告。

在政府的新聞出版部門與黨的宣傳部之間，審讀工作重疊交叉，作用在於可以互相監督。如果有些媒體出現「重大政治錯誤」，政府系統的審查員們沒有審查出來，卻又被黨務系統的審查